

第四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考察報告比賽
4th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of Study Projects on
Hong K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高級組亞軍
Second Prize, Senior Division

王肇枝中學
Wong Shiu Chi Secondary School

「華路藍縷話從謙 —
由從謙學校看新界小學教育的發展 (1914-1971)」
“Tsung Him School”

*版權所有，未能上載圖片
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 參考資料室
預約查閱，電話 2724 9009

目錄

第 1 章：引言	1
1.1 研究範圍	1
1.2 研究方法	2
1.3 章節簡介	4
第 2 章：肇基龍山 立村崇謙	5
2.1 肇基龍山	5
2.2 立村崇謙	6
2.3 模範村落	8
第 3 章：山丘下的穀詒書室	10
3.1 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新界教育	10
3.2 津貼的開始	11
3.3 穀詒書室的成立	13
第 4 章：山丘上的從謙學校	16
4.1 走出崇謙堂村之外	16
4.2 從謙學校的緣起	18
4.3 教育政策的調整	20
4.4 服務客家社群的學校	20
4.5 現代化的課程	23
第 5 章：鐵蹄下的從謙學校	25
5.1 日本佔領香港	25
5.2 鐵蹄下的從謙學校	26

MH12939



MH12939



5.3 戰後重建與政府資助	27
5.4 從謙學校復課	28
第 6 章：急促發展的小學教育	31
6.1 戰後教育政策改變緣起	31
6.2 具體執行措施	32
6.3 從謙學校的擴建	35
6.4 邁向六年免費教育	37
第 7 章：成功的社會組織 從謙學校	39
7.1 不斷求變的社會組織	39
7.2 配合發展的社會組織	40
7.3 任用得人的社會組織	41
參考文獻	43
附錄	
附錄一《呂潤生校長訪問紀錄》	46
附錄二《溫萬儀老師訪問紀錄》	55
附錄三《羅惠燕博士訪問紀錄》	67
附錄四《呂潤生校長訪問紀錄》	73
附錄五《溫煌有先生訪問紀錄》	78
附錄六《彭國禮先生訪問紀錄》	84

1.1 研究範圍

1914 年，對從謙學校和新界教育發展來說都是重要的一年：從謙學校的前身穀詒書室於當年創立；與此同時，香港在殖民地政府的統治下，於當年開始津貼新界的小學教育（當時新界只有小學）。1971 年，對從謙學校及香港教育發展來說也是重要的一年：當年從謙學校上、下午共開辦 24 班；香港亦於當時 9 月，在小學推行六年免費教育。

由 1914 年走到 1971 年，只有 57 載。在這 57 年的光景裡，從謙學校由一間主要服務崇謙堂村客籍基督徒子弟的村校，逐步發展，校務日隆，至 70 年代成為一個服務全區的小學。在這 57 年的光景裡，香港政府對新界小學的津貼，由每月只得五元發展到完全津貼，發展到最後實施小學免費教育。

本文旨在探討從謙學校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它的發展歷程；又嘗試探索香港政府在新界以至全港小學，實施津貼的制度的演進及其背後的原因；並希望將從謙學校這個社會組織的小歷史，與香港政府津貼新界小學教育的大歷史結合，從中看

到從謙學校不斷轉變，與時並進的成功之道。

1.2 研究方法

我們以文獻搜尋和訪問進行這次考察研究。溯本追源，從謙學校由穀詒書室起計創立已有九十二載，要追尋九十多年前的文獻資料，的確有些困難。在原始資料方面，為搜集有關 1914 年開始在新界實施津貼的情況，我們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香港特藏搜集由 1914 年至戰後的的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和教育司署的 Annual Report，不但找到有關政策的資料，有些內容還對從謙學校有一言片語的描述。我們又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有關從謙學校在 1958 和 1966 申請免息貸款的檔案，有助我們了解免息貸款的詳情；而且更在那裡找到港督就有關修改《津貼規例》致英國政府的函件；在 CO129 港督與殖民地部來往書信中，我們又找到一份 1913 年對新界教育觀察的視學報告。我們亦找到《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有助瞭解崇謙堂村的發展。此外在網上以英文記載的《徐家祥回憶錄》，生動地描述 1920 年他在穀詒書室和從謙學校就學的情況。在二手資料方面，《從謙紀盛集》有助我們理解從謙學校歷史的概況；Constable 的著作又有助我們瞭解崇謙堂村的歷史和客家組織的創立的經過。

在訪問方面，我們採訪了從謙學校校監彭國禮先生、現任校長呂潤生先生、30年代校友溫煌有先生、60 年代校友兼現任從謙學校教師溫萬儀老師和從事鄉村學校研究的羅慧燕博士，他們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和意見。

彭國禮先生為從謙學校創辦人彭樂三先生之孫。五、六十年代曾在從謙學校就讀，現居住在彭氏在崇謙堂村的祖屋乾德樓。他提供的《香港新界粉嶺龍躍頭崇謙堂村誌》的原稿，內裡有從謙學校在 1925 年籌款資料，是兩間大學所藏版本沒有的，故此極其珍貴。

呂潤生先生為現任從謙學校校長，自 1969 年於羅富國教育學院畢業後，便開始在從謙學校任教。呂校長自小在九龍坑長大，當時也在九龍坑和大埔頭的村校接受小學教育，對戰後鄉村教育發展知之甚詳。

羅慧燕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講師，現正進行一項有關香港鄉村教育的研究，對鄉村教育發展有深入研究。

溫煌有先生現年七十六歲，一九三九年入讀從謙學校，是從謙學校三十年代的學生。一九四一年日本佔領香港，令學校停學，他亦暫停學業；戰後復員後入讀三年級，但稍後又輟學歸田，後來往英國工作。溫先生對二次大戰前後從謙學校的情況有深刻記憶及切身體會。

溫萬儀老師是從謙學校的舊生，亦是謙學校的老師，後來舉家移民英國，大學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SOAS）唸中國歷史。其實溫老師醉心中國文學，於 97 年回流香港，後來更放棄在高等法院任職翻譯的工作機會，返回母校任教至今。

*版權所有

1.3 章節簡介

在第 2 章，我們大量引用《香港新界粉嶺龍躍頭崇謙堂誌》的資料，追溯崇謙堂村這一條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村落，村民如何從李朗移居崇謙堂村的經過，以及初年進行的社區建設，而從謙學校正是該區重要社區設施之一；在第 3 章，我們引用原始資料和徐家祥先生的回憶錄回顧政府在新界推行津貼制度的緣起和穀詒書室成立的過程；在第 4 章，我們探討彭樂三先生如何組織客家社群、維護客籍人士利益，透過參考捐款紀錄及當時從謙學校學藉資料，剖析從謙學校由服務基督教的社群的書塾，轉變成為粉嶺區客家族群服務的正規小學；第 5 章是全文最悲慘的一章，描述香港淪陷時期從謙學校停課的歷史，我們又從檔案館中找到珍貴資料，顯示戰後復員時政府為何非但沒有減少對新界小學教育的津貼，反而投放更大的資源；國共內戰後大量難民湧入，我們在第 5 章從大量原始資料探討政府如何妙用《津貼則例》，引入民間力量增加學額，而從謙學校又如何從善用該則例進行擴建計劃；在第 7 章，我們以探討從謙學校作為一個成功的社會組織，如何轉型去適應和配合香港政府在新界推行小學教育的政策以此作全文總結。

第 2 章：肇基龍山 立村崇謙

粉嶺龍山區（即龍躍頭），傳統上是鄧族的勢力範圍，光緒二十四年，即公元 1897 年開始，一群外來的開拓者陸續來到龍山，開始了跨世紀的鄉村發展，譜寫出崇謙堂村驕人的歷史。他們全都來自李朗，全都是客家人，而且同是巴色會（Basel Mission，香港崇真會前身）的基督教。

2.1 肇基龍山

粉嶺龍躍頭（即龍山鄉），新界鄧氏早於五百年前便已定居於此（Constable, 1994, p.41），建立五圍六村。崇謙堂村位處龍躍頭，和粉嶺其他村落相比，它的歷史較短，1898 年駱克（Lockhart）對新界進行過一次詳細的調查，在其報告中並未提及崇謙堂村，崇謙堂村的名字首先出現在 1911 年人口普查的報告上，當時有分別男、女各 19 人，可見該村立村應在 1898 至 1911 年間。

其實早在 1897 年，已有來自新安縣李朗的客籍人士來到龍躍頭定居。1897 年李朗人江大乾及其子江養來到龍山，分別在新屋村及小坑村貲屋租田，從事農業，他們介紹陳樂真牧師到龍山經營免窟；翌年，李朗人江大威、江阿滿父子到祠堂村居住，並租得鄧氏燕詒堂田地，惟生活困苦難以維持生計，居住三年後於 1901 年返回李朗。1901 年凌品忠叔姪亦來到麻笏圍租用田地，並介紹凌啟蓮牧師在現今崇謙堂村所在的松冚塘購置田業，這才是崇謙堂村肇基之始（彭，1934, pp.5-6）。

2.2 立村崇謙

凌啟蓮牧師生於 1844 年，巴色會教士，新安布吉人。其父 Ling Chun Ko 是巴色會早期華人教士，後遷居李朗，協助巴色會 Theodore Hamberg 在李朗建立教堂、男子寄宿學校和神學院。凌啟蓮牧師在巴色會服務三十年後退休。他於 1903 年購入現今崇謙堂村的一幅土地，此地初名松冚塘。及後，凌氏邀請其親友前來從事稻米種植工作，故當時崇謙堂村中多是為凌氏工作的陳姓和凌姓人。Constable 引述其孫凌道揚博士的說話，指移居崇謙堂村的人，早在布吉時已經是信徒。他們建立一個小的地方作崇拜之用，稱之為長興堂，其後易名崇謙堂 (Constable, 1994, pp.50-51)，而松冚塘亦正名為崇謙堂村。

*版權所有

圖 1：1927 年，崇謙堂開幕紀念

Constable 指崇謙堂村是透過宗教網絡 (Religious network) 建立，人們在教會辦的教堂和學校認識，透過介紹，陸續移居崇謙堂村(同上, p.49)。對崇謙堂村，甚至粉嶺區客籍人士深具影響力的彭樂三先生，亦是透過這種宗教網絡來到崇謙堂村。彭樂三先生於 1875 年出生於新安縣龍華鄉，分別在 1889 年和 1893 年

肄業於新安李朗小學和長樂元坑中學，1896 年肄業於李朗神道學院(從謙，1959，p.20)。彭樂三先生早在光緒三十一年（1904），已到龍山傳道，並留下好印象。彭樂三先生來龍山傳教，和凌啟蓮牧師有極大關係，原來凌牧師致力於崇謙堂村的教會事務，他請求巴色會委派傳道人到崇謙堂村協助建立教會，於是巴色會委派了彭先生到來傳教(Constable，1994，p.52)。但彭樂三先生傳教七載，最後「因家務紛繁，不獲專心教會職務，乃辭職，別營生業。」(彭，1934，p.6) 這七年間彭先生經歷了很多不幸遭遇，其內姪廖其銘先生指彭先生之胞弟福添去世，一家又遭逢強盜明火夜劫，後更於畢架山遇盜截劫 (廖，1934，p.16)，故於 1910 年，「與凌牧啟蓮合資建築乾德樓」(彭，1934，p.6)，並用了他所有的積蓄在崇謙堂村買地。乾德樓落成後，凌啟蓮牧師與長子凌善元先生正式在此定居，後來卓馨高、丘道安、徐仁壽、曾廷輝、張和彬、徐光榮、徐光宗諸位先生相繼遷來 (彭，1934，p.6)。

*版權所有

圖 2：穀詒書室創辦人之一彭樂三先生

*版權所有

圖 3：當時教會在崇謙堂村的活動

Constable 指，現今崇謙堂村部份土地，約有一半原由龍躍頭鄧氏擁有，其餘為官地（Crown Land）。1905 年凌啟蓮牧師向鄧氏購入崇謙堂村及鄰近 10.5 英畝土地，約佔崇謙堂村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十。鄧氏於其後二十年間，把在崇謙堂村餘下土地陸續轉讓給崇謙堂村的客籍基督徒。彭樂三先生則在 1913 至 1918 年間，從公開拍賣中購入崇謙堂村三英畝官地，至此，崇謙堂村便具雛型（Constable，1994，pp.46-47）。

2.3 模範村落

《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中，崇真會何樹德牧師曾形容崇謙堂村為模範村：

所謂模範村者，質言之，則出入有公路，靈修有教堂，教育子弟有學校，療治疾病有醫院，死喪殯葬有公墳，人各安其居，樂其業……丙寅（1926）仲秋，南下巡探教會，始悉香港新界龍躍頭，真有如揣想之模範村……獨缺醫院，而公立紅十字醫所則又近在咫尺，足補醫院之缺矣。且全村男女百餘人，悉信奉基督，親愛友助，不啻家人至親，有基督化福音村之稱。（彭，1934，pp.1-2）

何樹德牧師視崇謙堂村為基督化的模範村，的確，崇謙堂村自立村之後，便進行了一系列社區設施的發展計劃。在《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1934）裡，彭樂三先生將這些建設的發展過程和當中遇到的波折一一羅列。作為一條基督徒聚居的村落，教堂當然是不可或缺的社區設施，自立村後便設一小屋作教堂，名

為長興堂，其後更名為崇謙堂，由於地方不敷應用，一座單層的新教堂於 1927 年落成。而經安樂村至粉嶺區的道路和木橋基本上於 1909 年完成，在 1928 年，主要由崇謙堂村出資，加上政府資助 900 元興建的石橋也完成了。Constable 指客家人普遍認為教育是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 的重要工具，加上區內沒有用客家話授課的學校，村民決定建立自己的學校讓本村兒童就學，並希望吸引非基督徒進入教會(Constable, 1994, p.54)，穀詒書室便在 1914 年，於村中一個小山丘的山脚下成立，它便是從謙學校的前身。

第3章：山丘下的穀詒書室

宣道育才，是基督教化教育的理想，從謙學校的前身穀詒書室便在這個理念下在1914年成立，1914年除了是穀詒書室創校的里程碑外，對新界教育尤為重要，由是年開始，香港政府資助新界學校。

3.1 1914年以前的新界教育

教育一直都是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重要環節，新界居民早已頗重視教育，最早的書室可說是錦田桂角山下的力瀛書齋。至清代，區內共有五十多所較具規模的書室，大多分佈在新界望族的居住地，如錦田、屏山、廈村、上水、大埔、新田、泰亨等地。十九世紀，最普遍的是學塾教學，利用祠堂、廟宇或書室作為教學之所。一般村民都對入學「讀詩書、頌聖賢」非常重視；加上學費低廉，家貧者更會獲得酌免，因此就讀學塾的人數不少（吳倫，1997，pp.419-421）。

但英國人對中國式教育則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在 CO129（港督與殖民地部來往書信）中，找到 1914 年港督梅含理(Henry May)致英國國會議員 Lewis Harcourt 的函件，內夾附著一份 1913 年教育司 Irving 撰寫的《津貼學校(新界)》報告。原來 1913 年，政府為加強對教育的控制，通過《教育條例》，規定凡有學生九名以上的私立學校須向政府註冊，由於條例適用於新界，故教育司署派出庇理羅氏女校高級中文教師宋學鷗到新界進行了半年的考察。

報告對新界教育的評價實有保留，指學校的課室只是村民興建的簡陋民房，骯髒和黑暗。學生的學習時間「長得令人厭煩」：學童於早晨上學直至黃昏，當中只容許他們回去吃早餐和午餐，教師工作時間很長，到吃晚飯的時候才算完成一天的工作。不過，教師往往只教學生怎樣讀和怎麼寫一個字；最可怕的是，有位在學七年的學童連「子」字也不會解釋。學童不會跟教師說早晨，不會起立回答老師的問題，老師亦不會阻止或責罰學童。報告又指大多數教師只把教育視為副業，他們亦是村中的醫生或風水師，根本沒任何現代教育的知識和遠見。當時沒有特定的學費，但學生除了要支付學費外，還要分擔供給教師茶葉、菸草、和燃料的開支，有些學生更要支付教師食物的費用。可是，學生常常不會繳交全部的學費，因此大部分教師最終亦會放棄他們教育的職業(Irving, 1913, pp. 258-260 in C.O.129/4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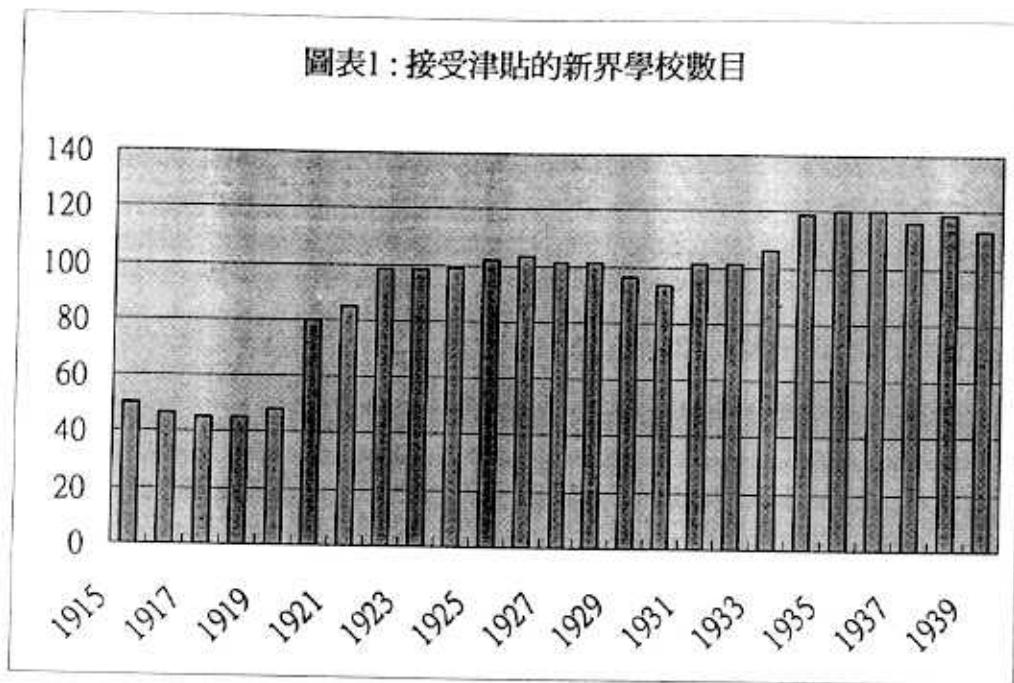
3.2 津貼的開始

Irving 認為，在新界教育有三大問題，分別是師資、交通和語言：很難找到合適的教師、地區偏遠而且缺乏道路、本地人和客家人語言不通。但他同意宋學鵬的建議，由 1914 年開始實施津貼計劃，選出五十間辦得比較好的新界學校，每月提供 5 元，即每年不多於 60 元的津貼。實際上當時獲選的新界學校只得 23 間，

其中以本地話授課的有 10 間，客家話授課的則有 13 間(Irving, 1913, pp. 261-263 in C.O.129/409)。

1914 年農曆新年前後，津貼計劃正式在新界施行。Irving 建議，視學官每年最少巡視接受津貼的學校一次；副視學官則在一年內進行最少三次巡視。津貼分四期由視學官或副視學官發放，如有需要，他們可情商警務人員協助(Irving, 1914, p. 1 in C.O.129/409)。津貼制度在 1916 年作出改變，由定額津貼變為分級津貼，制度將學校分為三級：甲級學校是指有高教學水平 (Ko Tang)，而且校舍、紀律和設備都屬優良；乙級學校是指校舍或教學不及甲級水平，但教學尚算滿意；丙級學校是指教學只是僅僅符合要求，但校舍和組織不甚理想。由 1920 至 1925 年的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得知，甲級學校每年獲一百八十元津貼，乙級學校則為一百二十元，丙級學校只得六十元。由 1915 年至 1939 年止，新界區接受津貼的學校大幅增加，由 1915 年的 50 間，增加至最高峰時 1936 年的 120 間，這數字反映了津貼計劃在新界大受歡迎(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15-1939)。

圖表1：接受津貼的新界學校數目



3.3 穀詒書室的建立

穀詒書室的建立得力於彭樂三先生和宣教士張和彬先生。自彭樂三先生辭去崇謙堂村傳道的職務，由巴色會新派宣教士張和彬先生繼任。張和彬先生把宗教和教育融和為一，招收村中兒童到教堂學習；而彭樂三先生眼見村中和鄰村兒童多數失學，出於憐憫之心，決意創立學校。《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中記載：

本村自彭君抵此宣教。尋且辭職。經營家務。決計卜居後。因鑒於本村及鄰村學齡子弟。因附近無相當學校。多致失學。心甚憫之。乃於一九一三年癸丑秋。由彭君提出數百元。在小山之陰。建築臨時校舍。(彭，1934，p.11)

1914年，穀詒書室（村民亦稱它為「書房仔」）正式上課，張和彬先生兼任教學工作。當時因為經費困難，學生都要自備桌椅去上學。由於張和彬先生以其堅卓

精神克服物質的不足，令校譽在數年中鶴起。鄰近鄉村，如蓮塘尾、九龍坑、南華埔、流水響和大窩等的村童都來穀詒書室就讀。當時沿用內地學制，全為春季開學。學生每年的學校只收五元，貧家子弟則酌收稻穀一石(從謙，1959，p.17)。穀詒書室名字的由來已不可考，但彭樂三先生建立用以管理田產的祖堂名為穀詒堂，而書室主要由彭先生出資創立，故命名為穀詒書室亦很合理。

穀詒書室仍採用傳統書塾的形式教學。徐家祥先生在回憶錄中記載，由於 1925 年春從謙學校的建築工程尚未完成，學校將穀詒書室用作臨時教室，還請張和彬先生作代課老師，故此他有機會接觸書塾形式的教學。書室只有一間課室，而課室中的情況就如交響樂團般，因為同一時間有四級不同年級的學童在上課，在點名後的自修課，大家都用最高的聲浪去誦讀不同的課本：有些在背誦經學，有些則唸乘數表。

穀詒書室成立於 1914 年，據《從謙紀盛集》記載，當時「每年都會獲得香港政府教育司津貼費港幣六十元」(1959，p.17)。教育司署在年報中對新界學校是以村為登記單位前，在 1925 年前穀詒書室分別以 Chung Him Tong、Chung Am Tong 和 Tsung Am Tong 的名字出現，分別在於前者以粵語發音，後二者以客家話發音。穀詒書室的名字首先見於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16，由此可見「書房仔」在 1916 年，甚至再早已獲香港政府教育司津貼。在 1920 至

1924 年，穀詒書室更被評為乙級學校，每年均獲得津貼費一百二十元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20-24)。穀詒書室被評為乙級，相信是因為校舍問題，因為 1925 年從謙學校落成，獲教育司津貼每年 300 元，數目遠高於甲級的 180 元(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25 , O18)。

徐家祥先生回憶錄見 <http://www.galaxylink.net/~john/paul/>

第4章：山丘上的從謙學校

如果說穀詒書室是為崇謙堂村和鄰近村落的學童提供基督教化教育的話；那麼，從謙學校的成立，便是為粉嶺區的客籍學童提供小學教育。1920年代，彭樂三先生展開了一系列的社區運動，先後籌組了聯安堂、聯和堂等組織，1925年也在同一的處境下將穀詒書室升格為一間正規的小學，它便是從謙學校。

4.1 走出崇謙堂村之外

彭樂三先生和徐仁壽先生不單是從謙學校的創辦人，他們更有姻親關係，彭樂三先生的夫人徐清和女士，正是徐仁壽先生的姊姊。1924年彭樂三先生介紹徐先生於崇謙堂村建造石廬大廈居住，並邀請他籌建從謙學校。徐仁壽先生原籍長樂粘坑，其父徐道良先生畢業於李朗神道學院，其後在香港經營，故徐仁壽先生於是時隨父來港並肄業於若瑟書院，1919年，首創香港華仁書院(從謙，1959，p.21)。在徐家祥先生的回憶錄裡，記載了在徐仁壽先生定居崇謙堂村後，彭樂三先生和徐仁壽先生即聯合起來展開一系列社會公共關係運動（Socio-Public Relations Programme），當中包括創辦從謙學校，和建立一個客家族群組織「聯和堂」。

*版權所有

圖4：從謙學校董事會第一屆董事，
徐仁壽先生站於前排中間。

其實在二十代初，新界飽受強盜土匪的騷擾，故彭樂三先生聯合二十位多位本村及鄰近較富有的村民組織聯安堂，會員包括客家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還有廣東移民和一、兩個本地原居民(Constable, 1994, p.56)。據徐家祥的先生的回憶錄記載，這是一個自衛組織，每戶會員要自備一支短槍及少量彈藥，更須向警方取得許可證，亦要購置銅鑼，以作警報系統。聯安堂每年安排四次聚餐活動，加深彼此認識。

彭樂三先生於二十年代後期更創辦了聯和堂，這是一個較平民化的客家族群組織，主要是維護崇謙堂村客家基督徒的利益，以及保持與鄰近地方客家人的聯繫，會員只限於客家人，吸引了粉嶺其他村落，包括安樂村和龍躍頭的客家人加入(Constable, 1994, p.59)。徐家祥先生在回憶錄記載，每年農曆正月初八，客家社群中每家的戶主，便會參加團拜和週年大會，討論大家關注的共同利益。

彭樂三先生的影響力不局限於崇謙堂村，他更是新界鄉民的代表(同上, p.60)，甚至有理民官稱他為「客家皇帝 (King of Hakka)」。他於 1925 年組織新界農工商業研究會，發展新界公益事業，後由港督金文泰改名為大埔鄉議局，他先後任義務局長七年半(從謙, 1959, p.20)。Constable 指彭樂三先生的成功，在於他的組織力，透過聯和堂，他凝聚客家基督徒與客家非基督徒的力量，爭取雙方的利益；透過聯安堂，又可以增進富有的客家家庭與廣東家庭的關係(p.60)。

4.2 從謙學校的緣起

《從謙紀盛集》(1959)對從謙學校的成立，有以下的描述：由於穀詒書室屋宇狹窄，彭樂三先生、凌善元先生和張和彬先生等便決心創建正式校舍。香港華仁書院校長徐仁壽先生力贊彭樂三先生建校的計劃，連同蕭官姐、林壽廷、黃熾南和李仲莊諸先生等的樂助和勸捐，以及香港政府贊助的二千元，終於在 1924 年，在崇謙堂村左旁的小山上興建校舍，並定名為從謙學校。至 1925 年春天，校舍建成，共有兩間課室、兩間教師宿舍和一個廚房，初時只開辦初級小學。由彭樂三先生為校監，徐仁壽先生為校長，都屬義務性質。再聘請廖其銘先生為主任教員，張求志先生為教員。當時學生約有七十餘人，進行分班授課。校舍的開幕典禮於 1925 年 5 月 9 日舉行，邀得教育司蒞臨主持。1926 年，從謙學校為了增辦高級小學，彭校監和徐校長等人遂向社會人士勸募第二次經費，得旅尖尾架(即牙買加)丘毓香先生、旅檳榔埠李玉盛先生和旅巴拿馬張君煌先生等，悉力贊助。決定在原本的校舍左旁增設一間課室、一間辦公室、一間宿舍，並增添校具和圖書儀器等。至 1927 年 7 月，從謙學校成為完備的小學 (pp.17-19)。



*版權所有

圖 5：新界民政署何長禮先生為從謙
學校舍行奠機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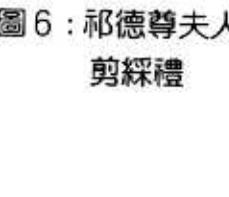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圖 6：祁德尊夫人為從謙新校舍行
剪綵禮



*版權所有

圖 7：祁德尊先生為從謙學校新校舍
開幕致詞



*版權所有

圖 8：1927 年的從謙學校校舍

其實，穀詒書室自成立以後，已建立良好的聲譽，自 1920 年開始，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將接受津貼的新界學校的資料羅列，穀詒書室已被列入較佳的乙級學校。在學生人數方面，由 1920 年的 11 人增至 1924 年的 30 人，由此可見穀詒書室學生人數大增，大有另建學校的需要。故此，彭樂三先生便決心創建正式校舍，並找來有辦學經驗的徐仁壽先生籌建新校。

4.3 教育政策的調整

從謙學校在二十年代創立，香港政府一反當時只發津貼不參與建校的政策，撥款二千元協助建校，並以低價撥地（彭，1934，p.13），其實這種改變和當時的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有關。1920 年代香港政府比較著重中文教育（當時稱中文學校為漢文學校，*Vernacular School*），一方面因為華人人口驟增，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影響，加上 1922 年的香港海員罷工帶來的社會動盪及反英情緒，香港政府不得不對中文教育的發展採取比較積極的態度（吳倫，1997，p. 447）。1926 年，香港政府更在新界大埔墟北盛街開辦一所三年制的漢文師範學堂，廣招新界各區有志於新界小學教育事業的青年入學，學生畢業後，就會介紹到各鄉村開辦學校，並給予資助（*埔師*，1973，p. 31）。由此可見香港政府在對參與新界教育發展的政策有所調整，從謙學校於是時創立，可見辦學團體的高瞻遠矚。

4.4 服務客家社群的學校

如果說穀詒書室是為崇謙堂村和鄰近村落的學童提供基督教化教育的話；那麼，從謙學校的成立，便是為粉嶺區的客籍學童提供小學教育。彭樂三先生擅於團結客

家基督徒與客家非基督徒的力量，為客家社群謀福祉，在建立從謙學校的過程中，可見他辦學的對象，不單限於崇謙堂村的學童，更惠及鄰村的客籍學童。在《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中，有這樣的描述：

因見就學學童日多。臨時校舍遂形陝隘。知非另建新校。鄰村子弟必多向隅之憾。(彭，1934，p.11)

但籌建一所新學校，所費甚鉅。彭樂三先生指，1925 和 1927 年的兩次建校計劃，單是建築費用，已逾一萬元（同上，p. 13）。政府雖有二千元資助，但不足之數仍由村民負責。在籌集建校經費方面，我們在《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中發現《初次樂捐建築從謙學校芳名》，其中羅列捐款人姓名，從謙學校校友兼現職教師溫萬儀老師為我們問過村中父老，在名單中出現的名字，知道所屬村落的有二十二人。捐款者除了崇謙堂村村民外，更有來自祠堂村、小坑村、麻笏、粉嶺、蕉徑、和合石、塘坑和坪輦的村民（見下表），而從謙學校以客家話為教學語言，由此可見建校資金是聯合粉嶺區內的客籍人士籌集的。

*版權所有

圖 9：為興建從謙學校的捐款名單



村名	捐款者	村名	捐款者
崇謙堂村	陳桂才	祠堂村	溫瓊高
	凌品忠		李玉榮
	張和彬		凌善元
	彭徐清和		溫勳高
	彭樂三		黃茂盛
	丘道安		林華元
	徐仁壽		丘國安
麻笏	溫先光	小坑村	李春記
	溫達華		丘毓廷
塘坑	陳盛昌	蕉徑	張有來
坪輦	蕭官姐	和合石	彭金發

圖表 2：初次樂捐建築從謙學校芳名

我們又翻查從謙學校學籍冊，發現 1925 年入學的 66 名學童，其中來自崇謙堂村的只有 15 人，佔學生人數的 23%，其餘則來自鄰近的村落的學童（見下表），其中祠堂村、小坑村、麻笏、粉嶺、蕉徑及和合石六條村的村民在 1925 年都有捐款，由此可見，無論資本籌集和學生來源，從謙學校由建立開始，已著眼於服務粉嶺區的客籍學童。

村名	人數	百分比
崇謙堂	15	22.7%
麻笏	4	6.1%
和合石	24	36.4%
坑頭	2	3.0%
李朗	1	2.0%
船灣	1	2.0%
祠堂村	2	3.0%
小坑	3	4.5%
蕉徑	2	3.0%
粉嶺	7	10.6%
虎地排	1	2.0%
石湖墟	2	3.0%
石湖	1	2.0%
金錢	1	2.0%

圖表三：1925 年從謙學校入學學生所屬村落分佈

4.5 現代化的課程

徐家祥先生是從謙學校第一屆學生，在他的回憶錄裡，說從謙學校的建築，是特別為學校而設計，故窗口特別大，以利採光。當時用客家方言和複式教學來授課，主任教師是來自李朗的廖其銘先生，另一位教師是張求志先生。他們各自負責兩班：廖其銘先生負責一年級和四年級，張求志先生負責二年級和三年級。他們都不主張傳統一起大聲朗讀的教學方法，所以當一半學生朗讀時，就安排另一半學生寧靜地工作，例如作文、練書法或做算術題。此外，張和彬先生每星期都會教授兩班聖經科；1929 年張和彬先生退休後，就由一位女教師任教宗教科。而每

日下午都有全校活動，例如唱歌、體育和集會，唱的歌包括當時內地的愛國歌、革命歌和流行曲，集會則由廖其銘先生演講一些勵志的說話。

*版權所有

圖 10：從謙學校內學童上課的情況

從謙學校的科目依據香港教育司署所定的漢文教授通則擬定，在 1925 創校時，由彭樂三先生和徐仁壽先生訂定的《謙學立從學校則》規定：一至四年級的科目為國文、算術、地理、常識、作文、經學、報寫、國語、體育、音樂、衛生和習字，三、四年級另設聖經和信札（從謙，1959，p.18）。此外，徐家祥先生的回憶錄，列出學童學習的中國典籍：一年級用《增廣賢文》；二年級唸《孝經》；三年級讀《孟子》；四年級則讀《論語》。他又提到在五年級時用 Crown Readers Series 的 Book O 學習簡單的英文。客家、國語、英文和後來的粵語並行，令從謙學校擁有兩文四語的教學特色。

徐家祥先生回憶錄見 <http://www.galaxylink.net/~john/paul/>
從謙學校歷史簡介見 <http://www.tsunghim.edu.hk/info/brief.htm#early>

第 5 章：鐵蹄下的從謙學校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揭開了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淪陷的序幕。12 月 25 日英軍宣佈投降，香港進入日治時期的黑暗歲月，從謙學校被逼停課，而且到處遭到破壞。1945 年 8 月 15 日，日軍投降，眼見從謙有復學的迫切需要，徐仁壽先生便承擔起學校重建的責任，並於 1946 年正式復課。

5.1 日軍佔領香港

陳達明戰時是東江游擊隊的成員，在《香港抗日游擊隊》他提到 12 月 8 日早上 7 時，日軍轟炸機向啟德機場以及港九各處戰略要地發動猛烈轟炸，「英國皇家空軍的 5 架老式飛機及 8 架民用飛機葬身火海了」。其後日軍進攻速度更快，迅速攻破英軍號稱可以堅守半年以上的「垃圾灣防線」，成功奪取了香港的制空權和制海權。日軍「在戰爭中還繳獲了英軍在港島的火力配備圖，使英軍的火力防禦網全部在日軍炮火控制之下」。英軍曾經組織抵抗日軍，但孤軍作戰，力量對比懸殊，因此無力抵抗日軍的侵略（2000，p.23）。香港淪陷期間，香港政府官員被囚禁在赤柱集中營（p.44）。港英政府的管治權力轉移到日軍手上。

*版權所有

圖 11：1941 年，日軍轟炸啟德機場

5.2 鐵蹄下的從謙學校

溫煌有先生是從謙學校戰前的學生，他清楚記得，當天他的一位朋友由華界騎單車過來，說日軍由深圳向新界推進。英軍一度炸毀了連接新界與深圳的羅湖鐵橋以防止日軍過河，之後又炸毀了孔嶺橋和一號橋，但亦不能成功阻止日軍佔領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由於從謙學校是當時區內比較具規模的建築，故被用作日軍憲兵總部，從謙學校被逼停課。日軍把犯人監禁在課室中，而課室則為厚木板及鐵絲網所封（從謙，1959，p.22）。溫煌有先生也曾聽聞，當時每天中午十二時，日軍便帶犯人到學校前的小河洗身，並常常用鞭打他們，那些犯人多為走私、搶劫的犯人。呂潤生校長亦提及，日軍當時把學校旁的足球場用作靶場，以處決游擊隊。

*版權所有

圖 12：曾經被日軍用作靶場的從謙學校足球場

戰時，從謙學校因為被日軍用作憲兵總部，學生因此被逼輟學，但從謙學校的教育使命並未因此停止，張和彬先生的女兒張瑞雲女士（雲姐），為從謙學校初期的教員（從謙，1959，p.21），當時雖然從謙學校停辦了，但張瑞雲女士在自己

家中為十多名學生私人教學，溫煌有先生也曾在那裏讀過幾個月書，可見她對教育的熱誠是無可置疑的。據溫先生所述，當時輟學的學生，大部分都回家幫家人耕田、種禾。

5.3 戰後重建與政府資助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軍投降，香港重新成為英國殖民地。戰後百廢待舉，在資源缺乏的時候，香港政府不但沒有減少對新界學校的津貼，竟然將開支預算由戰前的每年 51,000 元大幅增加到 100,000 元。在 Rowell (1945) 致軍政府首席財政顧問 (Chief Financial Adviser) Follows 的函件裡，指戰時新界學校遭到共產黨勢力滲入，戰後視學官在巡視那些受共產黨勢力滲入的學校時，遭受極不友善的對待 (most hostile reception)，故此，儘快將新界學校復員 (rehabilitated)，是首要的措施。

原來游擊隊除了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戰術與日軍作戰外（陳，2000，p.46），還幫助新界區的村民。當時新界成了土匪的世界，他們到處搶掠，一隊走了，另一隊又來了，游擊隊肅清了乘機而入，搶劫鄉民的土匪，如梅花馬和廉仔佬 (p.29)。而且又處決了敲詐勒索民生的漢奸，解村民

於水深火熱中。儘管游擊隊處處為民，但他們卻沒有佔村民任何便宜，堅持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傳統 (p.58)，更有當地客家人稱他們為「自己人」(p.57)。

此外，游擊隊的民運工作隊伍亦幫助村民組織群眾生產自救，幫助他們組織民兵、游擊小組，以及組織婦女會、識字班等等。村民為民運工作隊伍作了首山歌：

「難捨情來難捨情，擔杆難捨草釣繩；民鑊難捨山中草，阿妹難捨有情人」

(p.148)，這反映出他們深得民心。日軍宣佈投降後，游擊隊更以個人名義參加香港政府組織的自衛隊，繼續保衛新界地區 (p.164)。以上的種種原因，使共產勢力得以得到村民的支持，使港英政府擔心。因此，港英政府增加了對新界小學的資助以挽回人心，避免共產勢力進一步滲透。

*版權所有

圖 13：游擊隊戰士行軍時

*版權所有

圖 14：當時游擊隊的裝束

5.4 從謙學校復課

1946 年 5 月，政府在復員基金 (Rehabilitation Grant) 中，撥款 30,000 元資助

新界學校進行必要的維修，但要維修的學校達 84 間，撥款有如杯水車薪，故學校獲批的維修費往往低於要求的撥款（Rowell, 1946）。由此可見，戰後重修學校工程的費用，很多都由村民自負。

從謙學校經過日軍鐵蹄踐踏後，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圖書、儀器均受到破壞，散失四方；課室內的桌椅，亦悉數被日軍焚毀得體無完膚；更甚的是校外山地，竟被開闢為叢葬場所。彭樂三先生年事已高，乃請徐仁壽先生再任校長。徐校長義不容辭的解囊施恩，復校的事宜亦隨即展開，「修理課室，清理障礙，並禮聘教員」以預備復校（從謙，1959, p.22）。彭國禮先生指，在復校工程尚未完成前，他的母親亦是戰前從謙學校教員韓瓊立女士，已在乾德樓祖屋內授課，讓學童儘快上學讀書。

*版權所有

圖 15：乾德門下的彭國禮先生和我們合照

復課後，從謙學校的人數不齊，課室分配尤其困難，由於有大批一年級學生於戰

後入學，故「一年級分為兩班，各以單式教法授課，二年級甲班，與六年級，合為一室，二年級乙班，與五年級，合為一室，三四年級合為一室，各以復式教法授課」，雖知進度緩慢，但為了不欲村中子弟再度失學，故也採用此教法（1959，p.22）。後來，因為收支不平衡，故向政府申請恢復津貼。我們從香港歷史檔案館中 HKRS 170-1-1-170 的檔案，可以看到 1946 年的第三、四季，從謙學校得到的津貼金額有 1,200 元。從謙學校自復校起，學生人數日多，在 1959 年增至五百餘人，教員亦由 5 人增加至 16 人(p.23)，慢慢步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第 6 章：急促發展的小學教育（1946-1971）

1945 年香港重光，大量因戰爭離港的市民回流；1949 年中國解放，大批難民湧入。人口急促膨脹，為香港教育帶來沉重的壓力，香港政府在戰後全力發展小學教育，使小學教育逐步發展起來。政府透過修訂《津貼則例》，增加對小學教育的承擔，鼓勵民間籌建學校，又加強師資培訓和提高教師薪酬，用以改善教學質素。這些政策都反映了政府積極參與小學教育發展。至 1971 年 9 月，政府終於推行六年免費教育，從謙學校在這段時間，配合機會而大規模發展。

6.1 戰後教育政策改變緣起

1945 年日軍投降，香港人口只有五十餘萬，但到 1955 年人口已達二百五十萬，升幅近五倍（陸，2003 年，p.109）。戰時許多學生都被迫輟學，加上日軍由於糧食供應不足，將大批香港市民遣返內地。戰後這批於日治時期失學的學童，與戰後返港的學童（方，2002，p.8），為小學教育構成沉重的壓力。戰後中國大陸隨即發生國共內戰，又有數十萬農民、工人、商人、士兵和知識份子南來香港，人口膨脹的問題更為嚴重。起初香港政府認為這批內地人只是暫時逃避戰火的難民，然而在 1953 年平安夜石硤尾大火後，政府終於承認他們會定居下來，於是毅然推出擴大建校計劃（陸，2003，p.110）。

其實，香港政府態度的改變，除了因為人口構成的問題外，還和英國政府的政策有關。陸鴻基（2003）指出，戰後英國選出工黨政府執政，要在本土確立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同時，在各殖民地傳達政策文件和發放小量津貼，希望推廣類似原則。香港政府於是增加在小學教育的參與，配合英國的政策，偏離戰前的放任

方針，承擔起為廣大市民提供小學教育的責任，讓有志送子女入學的家長得償所願，但政府還未有意識到要推行全民義務小學教育，更沒有想過要去承擔所有教育經費(p.113)。

1954 年，香港政府通過七年興校計劃（Seven-year Primary School Expansion Programme），計劃每年增加小學學位 26,000 個，為全港適齡學童提供小學學位，計劃包括擴大葛量洪師範專科學院，以提供足夠的師資；加建官立小學，每年提供 6,430 個小學學位；增加對津貼學校的資助，並實行上、下午校制；提供免息貸款給非牟利辦學團體建校或擴校（Education Dept., 1954, p.45）。

6.2 具體執行措施

羅惠燕博士指出，香港政府在 50 年代擴充小學教育的時候，並非由政府獨力承擔，民間的努力和資源，發揮很大的作用。就以 1954 年為例，政府計劃增加 26,000 個小學學額，但官立學校提供的只佔 6,430 個，由此可見，政府著意用民間辦學團體主力承擔沉重的擔子，而政府則從旁透過《津貼則例》（Subsidy Code）增加對小學教育的參與。

我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一份港督葛量洪致殖民地大臣有關修訂《津貼則例》的函件（Grantham, 1948），內裡夾附一份《津貼則例》，原來《津貼則例》早於 1941 年 6 月通過。《津貼則例》分為兩項津貼，分別是經常費（Recurrent Subsidies）和資本津貼（Capital Subsidies）。經常性開支是指學校一般的營運經費，包括教師的薪金、租金及其他獲教育司批准的雜項開支；資本津貼則是用作建築及購買設備的費用，《津貼則例》授權政府津貼受助學校不少於一半的經常費（Recurrent Subsidies）。1952 年，政府解釋《津貼則例》之目的有三：鼓勵信譽良好的辦學團體，特別在鄉郊地區，去進行建校或擴校計劃；保持學費在一個合理的水平；確保一個穩定的教師薪酬 (Education Dept., 1952, p.14)。

雖然《津貼則例》授權政府津貼受助學校不少於一半的經常費，但戰後，政府增加對經常費的承擔，由一半增至全部。1950 年教育司署年報指出，雖然《津貼則例》訂明津貼學校獲得不少於一半的補助（financial deficit，即扣除學費外不足之數），但幾乎所有津貼學校都獲得經常費的全數津貼 (Education Dept., 1950, p.14)。資深村校校長鄧承基指，戰後「教育司對於新界學校之資助，又改用完全津貼法，……經常費完全由政府負擔」（鄧，1973, p.31）。這個措施減輕了民間辦學團體的財政壓力，只要籌得首筆的開辦費用，便能為村中學童提供教育，「於是新界各地學校，就一間一間的建立起來」（同上）。

1948 年，政府又透過修改《津貼則例》中資本津貼（Capital Subsidies）的條款，鼓勵民間非牟利辦學團體建校和擴校。在葛量洪致殖民地大臣的信件中，解釋 1948 年《津貼則例》其中一項修改，是賦與教育司有權批出多於一半的學校建造費用，但以二萬元為限（Grantham, 1948）。在通常的情況下，如果建築費用多於二萬元，政府承擔一半，這便政府稱為 one dollar for one dollar 的建校政策。為鼓勵辦學，在 1954 年的七年興校計劃中，更為非牟利辦學團體提供免息貸款以作建校或擴校資金（Education Dept., 1954, p.45）。

為提升教育質素，吸引更多合資格的年青人加入教師隊伍，1948 年修訂的《津貼則例》，又提高津貼學校的教師薪酬，薪酬增至官立學校教師的三分之二（Grantham, 1948）。原來，1946 年 9 月，師範專科學院出現嚴重的收生不足，空置學額竟達一半（Education Dept., 1954, p.1）。教師薪酬的提高，無疑使更多有志服務教育的年青人，投考師範專科學校，加入教師隊伍。為解決戰後新界鄉村教師嚴重短缺問題，及提升師資質素，香港政府在 1946 年 9 月創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與羅富國師範專科學院成為香港僅有的兩所初等教育師資培訓學院。鄉師一共辦了八年，是當時新界學校的重要師資來源，前後共招收一百 193 名學生，其中 181 人順利畢業並成為新界鄉村學校的教師（方，2002, p.8）。

6.3 從謙學校的擴建

戰時從謙學校是日軍憲兵總部，戰後稍事修整，於 1946 年復課，其實校舍已遭受極大的破壞：承托屋頂的木構支架為白蟻蛀蝕，兩間課室和廁所已不能使用 (Ho, 1958, p.2)。早於 1950 年前，從謙學校已有向教育司申請免息貸款及資本津貼，以重整校舍的計劃，徐仁壽先生願意捐出一萬五千元作為擴建經費，但在 1950 年 10 月遞交大埔理民府轉交教育司的建築計劃，基於未被列入最急需而被撤回。1952 年的申請，又因為財政預算期限已過而要延遲 (從謙, 1959, p.33)。直到 1955 年，副教育司毛勤與其他官員到從謙視察，商討容納失學兒童辦法，發現從謙校舍在戰時的損毀程度十分嚴重，必須進行改建，因此接納從謙擴建的申請 (陳, 2006, p.212)。當時校監兼校長徐聲祥先生須專心從事教學發展，董事會因此於 1956 年 8 月推請徐家祥為從謙學校校監，以策劃擴建工作 (從謙, 1959, p.33)。

*版權所有

圖 16：1959 年改建後的從謙學校

我們在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了從謙學校申請免息貸款的檔案，知道當中的具體安

排：校址佔地六萬平方呎，大部份為官地，當時市值六千元，由理民府免費批出（Dodge, 1957）；政府撥出七萬元為資本津貼（建築 59,000 元；校具 11,000），另加免息貸款 61,000 元（Donohue, 1958），其餘由從謙學校自行籌募。這個比例和當時一貫的做法不同，當時一般情況是政府津貼建築費五成，其餘三成為免息貸款，兩成為辦學團體籌募。原來 1958 年招標後，發現實際建築費為 184,270 元，超出預算三萬多元。於是從謙向教育司署申請增加津貼，教育司署立即派遣助理教育司唐露曉、高級教育官黃國芳到從謙學校視察並進行商討，政府事後確認對從謙的建築津貼及免息貸款不能超出十二萬（從謙，1959, p.33），政府一方面維持按舊價批出建築津貼 59,000 元，另一方面在免息貸款上則照新價借出三成，即 61,000 元，分十一年償還，由此波折可見當時辦學艱難。

當時布政司向行政局要求通過撥款時，引述教育司的評語，指從謙學校是當時新界區辦得最好的學校之一（File No. BL23/1996/57）。教育司批准許，將原日學費減為每人每月二元，而另加堂費二元，所收堂費儘量積蓄，歸還政府（從謙，1959, p.34）。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要求從謙學校在建築上預留空間，以便在經費許可和小學學額緊張時，另外加建一層六個課室（Attwell, 1957, p.2），由此可見當時小學學額短缺的問題。我們在歷史檔案館找到當時新界村校的「標準校舍」建築圖，都是金字頂一層高的建築；然而從謙學校的校舍則是平頂，而且由建築師司徒惠設計，這種分別便是基於此協議。的確，在 1966 年，從謙學校再申請

免息貸款，進行一次耗資二十一萬多元的擴建計劃（Gamble, 1966）。擴建工程於 1967 年完成，從謙學校合共有十四個課室供教學之用，上、下午班共開二十四班授課（陳，2006，p.212）。兩次免費貸款中，政府都規定從謙學校要將學額開放給區內所有學童，而且要提供一成免費學位，至此從謙學校進入新紀元，為粉嶺區不同族群的學童，提供優質教育。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圖 17：1967 年擴建後的從謙校舍

圖 18：新界村校的「標準校舍」
建築圖

6.4 邁向六年免費教育

1961 年 12 月，七年興學計劃正式結束，七年間透過政府的津貼和民間資源的投入，總共製造了 318,000 個小學學位，比原先預計的超出 103,000 個（Education Dept., 1962, p.4）。為製造學位，可謂各出奇謀，連徙置大廈的天台也用作建立天台學校（香港年鑑，1959，p.44）。陸鴻基指，在最高峰時每 17 天便有一座新校舍落成（2003, p.114）。七年興學計劃大受好評，當時的教育司長高詩雅

曾說：「七年教育計劃之發展，質量兼重，一方面大量興建學校，另一方面則適當訓練師資。」這都顯示七年興校計劃對戰後小學教育高速增長幫助很大。

新界的小學教育自戰後發展得十分蓬勃，大量學校興建，學位增加，至 1971 年，政府更推行小學六年免費教育。六年免費教育的推行，是基於 1970 年官立小學出現學位空置的現象，當時空置的學位大約有 19,000 個之多（香港年鑑，1971 年，p.93）。政府認為空置學額並不代表供過於求，而是緣於家庭貧窮（Sweeting，2004，p.245），因此為了鼓勵家長讓子女上學讀書，便為小學生提供強迫性的義務教育。在所有官立小學及津貼小學提供完全免費的義務教育，對不願送子女入學的家庭進行調查，為其子女選擇適合的上學時間。然而六年免費教育的實施面對不少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堂費的問題。由於許多津貼或補助小學都曾向政府貸款建校，而學校還款都依賴堂費，免費教育實施後便不能再收取堂費，學校便失去還款能力（香港年鑑，1971 年，p.93），故此當時政府採取豁免還款的措施，1972 年 2 月 12 日，布政司署致函從謙學校校董會，指出由於在推行六年免費教育，豁免學校尚欠的四萬多元免息貸款的還款（Macleod，1972）。

第 7 章：成功的社會組織——從謙學校

1914 年於崇謙堂村創立穀詒書室，是一間只有一個教室、一位老師的小書塾；1971 年，從謙學校已發展為區內甚具規模，設施頗完備，有十四間課室的正規小學。這 57 年間從謙學校經歷四次擴建，也遭遇過香港淪陷、大傷元氣的打擊，但仍不斷發展，生生不息。從謙學校作為一個成功的社會組織，背後又有何因素推動它向前邁進，使其屹立不倒九十多載呢？

7.1 不斷求變的社會組織

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就有其社會功能，從謙學在不時代有不同的服務對象，亦具備不同的社會功能。早於一世紀前，一群來自李朗的巴色會傳教士來到香港新界粉嶺龍躍頭這片土地上建村立校，他們都是客家人。1914 年穀詒書室成立，其資源是來自有基督教背景的崇謙堂村，故服務對象自然以基督教家庭的子女為主，創辦人彭樂三先生和傳道人兼教師張和彬先生都認為，透過教育可以吸引沒有基督教背景的學童認識基督，走進教堂，故亦樂意取錄鄰村的學童入學，創辦人的興學目標清晰，為崇謙堂村和鄰近村落的學童提供基督化教育，故穀詒書室除了肩負著教育的功能外，更具備宣教的責任。

1925 年，穀詒書室改組擴大為從謙學校，其社會功能開始轉變。1920 年彭樂三先生銳意團結粉嶺區內的客家社群，爭取客家社群的共同利益，聯和堂便在這個信念下誕生。團結粉嶺區內客家社群力量，為客籍人士謀求福祉的信念亦在從謙學校的成立中發揮出來。由於擴建費用龐大，香港政府給予的資助不敷應用，於

是彭樂三先生和徐仁壽先生四出奔走勸捐，捐款者主要來自龍躍頭地區的客人，而受惠的學童也不再局限於有基督教背景的村民子弟。在此階段，從謙學校除了具備教育和傳教功能外，還背負著團結、維護客家族群的責任。

1958 年從謙學校向政府申請建校津貼和免息貸款，當時正值香港政府擴充小學學位的時期，從謙學校的社會功能又出現轉變。香港政府透過《津貼則例》在小學實施完全津貼法，發放經常費津貼和資本津貼鼓勵民間辦學。在兩次免息貸款中，教育司署都列明從謙學校的學額要開放給區內所有學童。從謙學校的社會功能又由團結客家族群，以客籍學童為服務對象，變成為區內所有學童提供教育機會。縱然社會功能進一步擴大及改變，從謙學校的客家特色並沒有因此而淡化，時至 2006 年的今天，其客家文化依然濃烈，在我們訪問期間，校長與教員間以客家話親切對談，而溫萬儀老師更深以客家人為傲。

7.2 配合發展的社會組織

如果新界小學教育的發展是大歷史，我們看到的從謙學校，便是配合大歷史發展的社會組織，從謙學校不同階段的發展與新界教育政策改變息息相關。1914 年由於要配合《1913 年教育條例》的實施，香港政府開始津貼新界小學，目的是

增加政府對教育的控制。當年穀詒書室正式創立，在 1916 年甚至更早，已獲得政府津貼。雖然校舍設備較差，但依然爭取到乙級學校的津貼。1920 年代，政府較著重漢文教育，穀詒書室值著這個契機，由彭樂三先生和徐仁壽先生向政府取得二千元資助以及低價批地，再籌集區內客籍人士的捐款，建立從謙學校，由書塾擴展為完備的學校，更開辦了初級和高級小學。戰後香港政府因為人口急劇膨脹，以及英國政府推行均等教育機會，不得不加大對小學教育的資助，但政府只透過《津貼則例》鼓勵民間辦學，以解決小學學額不足的問題。從謙學校亦配合小學教育增長的趨勢，向政府免息貸款進行大規模擴建，不但幫助政府解決小學學位不足問題，還將從謙學校的發展推向頂峰，踏入全盛時期。

7.3 任用得人的社會組織

從謙學校能配合新界教育政策的改變而發展起來，學校的領導人實有很大的關係。早期的彭樂三先生是在粉嶺區內透過他創立的聯和堂，與客籍人士團結爭取權益，又透過聯安堂和本地人保持良好關係，他創立鄉議局，甚至與港督金文泰保持友好關係，使他成為新界的地方領袖，利便從謙學校與政府官員的溝通。1934 年有人向政府申請批出從謙學附近的土地，都是由彭樂三先生與政府磋商而獲得解決(彭，1934，pp.13-14)。

徐仁壽先生為香港華仁書院校長，他亦是從謙學校創校校長，從謙學校自 1925 年建立，課程便是由他依照教育司署所訂的課程條而成，可見其豐富的辦學經驗對從謙學校日後發展大有裨益。戰後從謙學校亦在徐仁壽先生的帶領下復課，並重新得到政府津貼。

1958 年，從謙學校落實擴建，校董會委任徐仁壽先生的兩位兒子徐家祥先生為校監、徐聲祥先生為校長，這個決定對學校發展也很重要。徐家祥先生是香港首位華人政務官，人脈網絡廣闊。1958 年從謙學校為籌措擴校經費進行募捐，其中以徐家祥先生籌得最多，而且捐款者並不局限於粉嶺區人士：鄉紳有元朗鄧佩瓊、趙聿修；商界有恆生銀行的何添和何善衡；還有澳門富商何賢和梁昌，由此可見他人脈關係的完備。

徐聲祥先生為香港大學文學士兼取得教育文憑，以他的資格在當時的教育界可以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他熱愛園藝，且欲服務鄉梓，故回到從謙學校擔任校長一職，其對從謙發展影響深遠。擴校期間從謙學校和政府有大量公文往來和會面，在以英文為優先的殖民地時代，徐校長以英文書寫公文的習慣，不單有利與政府溝通，更令區內居民對從謙學校產生優越感。

參考文獻

原始資料

甲、政府年報及政府部門年報及信件：

1.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15-1939
2.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1949/50
3.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1952/53
4.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1954/55
5.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1962/63
6. Annual Report of the District Office, New Territories 1946/65
7. Annual Report of the District Office, New Territories 1973/74
8. 香港年鑑 1959
9. 香港年鑑 1971
10. 香港教育委員會報告書 1963
11. Irving, E.A. (1914)
 Letter from E.A. Irving to Colonial Secretary with Enclosure
 "Subsidied School (New Territories)" (in C.O.129/409)
12. Rowell, T.R. (1945)
 Letter from T.R. Rowell to Follows (in HKRS 1701-1-170)
13. Rowell, T.R. (1946)
 Letter from T.R. Rowell to Assistant Financial Secretary (in HKRS
 170-1-170)
14. Grantham, A. (1948)
 Letter from A. Grant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in HKRS 146-5-16)
15. Dodge, P.V. (1957)
 Letter from P.V. Dodge to Colonial Secretariat (in HKRS
 156-1-5478)
16. Donohue, P. (1958)
 Letter from P. Donohue to Financial Secretary (in HKRS
 156-1-5478)
17. Gamble, F.C. (1966)
 Letter from F.C. Gamble to Financial Secretary (in HKRS
 156-1-5478)
18. Macleod, N.W.H. (1972)
 Letter from N.W.H. Macleod to Tsung Him School (in HKRS
 229-1-1276)
19. File No. BL23/1996/57(1958)

乙、訪問：

1. 訪問呂潤生校長 (日期：8/3/2006)訪問紀錄見附錄 1
2. 訪問溫萬儀老師 (日期：12/5/2006)訪問紀錄見附錄 2
3. 訪問羅慧燕博士 (日期：30/4/2006)訪問紀錄見附錄 3
4. 訪問呂潤生校長 (日期：9/5/2006)訪問紀錄見附錄 4
5. 訪問溫煌有先生 (日期：12/5/2006)訪問紀錄見附錄 5
6. 訪問彭國禮先生 (日期：16/5/2006)訪問紀錄見附錄 6

二手資料

中文文獻：

1. 彭樂三(1934)
《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香港
2. 廖其銘 (1934)
《彭翁樂三花甲榮壽紀念刊》。香港
3. 從謙學校 (1959)
《從謙紀盛集》。香港
4. 大埔師範同學會(1973)
《埔師同學會會刊》。香港：大埔師範同學會有限公司
5. 吳倫霓霞(1997)
《教育的回顧(上篇)》載《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
6. 陳達明 (2000)
《香港抗日游擊隊》。香港：環球
7. 方駿 (2002)
《鄉村師範專科學校(1946-1954)：香港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頁》。香港
8. 陸鴻基 (2003)
《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9. 陳國成 (2006)
《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三·粉嶺》。香港：三聯

英文文獻：

1. Sweeting, Anthony (2004)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1 to 2001 Visions and Revi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 Constable, Nichole (1994)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 :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網上資料：

1. 徐家祥回憶錄 <http://www.galaxylink.net/~john/paul/>
2. 從謙學校歷史簡介 <http://www.tsunghim.edu.hk/info/brief.htm#early>

呂潤生校長訪問紀錄

日期：二〇〇六年三月八日

時間：下午四時

地點：從謙學校圖書館

呂潤生先生為現任從謙學校校長，自 1969 年於羅富國教育學院畢業後，便開始在從謙學校任教。呂校長自小在九龍坑長大，當時也在九龍坑和大埔頭的村校接受小學教育，對戰後鄉村教育發展知之甚詳。

問：我們知道從謙學校前身是「穀詒書室」，是一所私塾，為何在二十年代從謙由私塾變為村校？

答：正確來說在從謙學校的校史中亦有記載，在大約 1900 的前後十年期間，有一群教會的基督徒到香港新界傳教，其中有一位牧師來到崇謙堂附近傳教，以前這地區範圍很大，沒有細分，此處叫做龍躍頭，這群基督徒認為鄉村小朋友接受教育的機會不多，他們一方面傳教，一方面推動教育，覺得鄉村小朋友應該要有機會讀書，而且當時只有少量學校，在新界地區更沒有甚麼正式學校，傳道人其中一名叫做凌啟蓮，即為凌善元的爸爸，是一位正式的牧師，而彭樂三、張和彬則是傳道人，這群傳道人和鄉紳志同道合，集合在一起辦教育，因此建立私塾，其中較為出名的人是徐仁壽先生，當時他的教育水平較高，於是辦了一間「穀詒書室」，又或稱為「穀詒書院」，這就是從謙學校的前身，所謂書室或者書塾，亦即現在的小型私校。

問：其實私塾和村校有何分別？

答：首先在規模設備方面，私塾十分簡單，通常只是用祠堂作為教室，是公用的教室，也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大屋借出來，但一般都是以祠堂作為教室。由於資金有限，私塾內只有幾張桌椅，資源缺乏的甚至要學生自己攜帶桌椅上學。因此私塾只屬於簡單的私人學校。

穀詒書室由於有教會的支持，又有其他辦學者如徐仁壽先生等有影響力的人士參與，因此能夠爭取到政府的資助，雖然資金並不多，但亦有大約幾十元。而村校則屬於比較後期的模式，是規範化的書室，根據教育署正式的課程及規模，校舍也比較完整及完善。村校分為兩個時期，前期都是屬於私人辦學，後者則轉為津貼學校，這才是一個大的轉變。

問：呂校長可否為我們介紹從謙學校創辦的歷史？

答：這主要是容量問題，可從八十週年校刊或網上資料搜尋一下。當時的編制是農曆年後便開學，直到年尾便算一年，並非如現在般的暑假，初期時學生人數很少，在香港新界的學校數量也不多，因為交通不方便，沒有交通工具之類，很難乘車到九龍區等地讀書，因此遠至深圳、大埔想讀書的人也來從謙學校求學，根據本人記憶，約 1913、14 年便開辦「穀詒書室」，幾年後人數

便增多，出現學位短缺的情況，換言之便需要擴校了。這群創辦人並非農民出身，均為牧師、傳道人等，比較懂得尋找途徑，於是向當時理民府申請一幅土地，接著向教育署註冊成為一所學校，在 1924 年轉變成村校，直至 1927 年正式建成一間校舍，當然和現在的校舍樣貌大為不同（附圖）。在 1927 年便正式成為一所津貼學校，政府亦撥了一筆錢，其他則多由村民籌募，政府撥了二千元，也算是一筆頗大的數目，便建成了這座校舍，成為在新界中一所較完整的學校，根據村民所說，「穀詒書室」是山脚下的一間房而已，但只是憑記憶，並無甚麼文獻記載。

問：從謙學校與崇謙堂村有何淵源？

答：崇謙堂就是一條村，原本叫松磡村，那時凌善元的父親凌啟蓮每月也會來粉嶺兩次，傳教的牧師便想以此為一集中地，並藉此聚集教友，方便傳教，於是成立了教堂，故名為「堂」，也因此命名為崇謙堂。後來規模愈來愈大，於是改為「崇謙堂村」。

問：彭樂三、張和彬、凌善元三位先生是否新界原居民？

答：他們不是新界原居民，原居民的意思應是早於英國租借新界前已在此居住的，即 1898 年前他們應是在這段時期左右來港，所以嚴格來說，他們並非原居民，但他們來得早，便在此買地建屋，當時沒有規限，而英政府租借新界後沒有拆卸這些房屋，於是他們便建了很多祖屋在這裡，包括姓彭、姓徐等，而他們的後人子弟便如其他圍村般建屋，但其實他們是沒有丁權的。

問：那麼他們是來自哪裏的呢？

答：他們從內地五華來的，主要是為了傳道，他們並非偶然萍水相逢的，而是有姻親關係的。

問：崇謙堂村的人多數姓甚麼的呢？

答：現在都是雜姓的，以前多為姓彭、張、徐、陳、凌，但是現在許多鄉村人搬往市區居住，將居民出租，現在便多了雜姓的租客住在村內，這也是新界圍村的普遍情況。

問：那麼我們可否說，最初這裡稱為松磡村，後來這三位傳道人在此建立教堂，改名為崇謙堂，更愈來愈多人居住，從謙學校便是由崇謙堂村居民集資成立的，對嗎？

答：對了，我們是集資而起，但資金來源不只是自己村民的，可能是在別的地方籌募而來的，當時新界有名望的鄉紳如李仲莊等，他們樂於捐助，於是有一部份資金也是從他們而來的。

問：不知在校內的舊建築有否一些捐款碑文呢？

答：捐款碑文沒有了，但是很久以前我曾翻閱一本捐款冊，但現在卻不知擺放在哪裡了。在本校校舍課室門口有一些瓷相，是大約在 1958、59 年擴建校舍時因擴建資金龐大，故需要向一些富裕的人募捐，於是便做了瓷相以表感激。

問：早一星期前，我們曾到檔案館翻查從謙學校的資料，發現在 1958 年學校已向政府借貸六萬多元建一層校舍，是否意味著共需資金十多萬元呢？

答：正確來說，根據過往條例，津貼學校不論建校也好，維修也好，教育署會負責百分之八十的費用，學校則自行籌集百分之二十，紀錄裡的六萬多元該是全數五分一的費用吧！

問：我們看到的與呂校長所說的很相似，費用的五成由政府支付，另外三成則是免息貸款，那時還未實施全面津貼，對嗎？

答：對，剩下二成則由學校自行籌集，這是一貫津貼學校的準則，那即是說檔案紀錄政府貸款的六萬多元是全數費用的三成，那麼合共便約為二十萬了，那六萬多元是需要還款的。那時主要依靠收堂費和別人捐募，記得大約還款四年後。一九七零年，教育政策改變，幸運地不用再還款，也就是說往後建新校的費用均由政府支付。於是從謙學校便剩下了一筆資金，當時用作投資賺了錢，現在便剩下一笔可觀的金錢了，當然現在不可能再用作投資，因為條例修改了，當時徐仁壽先生之子徐聲祥在香港大學修讀會計科，所以他懂得投資方面的事，當年教育署沒有列明不可投資，所以現在立例所有津貼學校不可有此類投資活動，恐怕會出現一種情況就是盈餘據為己有，虧蝕便由學校支付，因此津貼學校不可作此類投資，假若買了則需要校董會承諾賺的錢為學校所有，而虧蝕則由校董會負責。

問：在穀詒書室年代已獲政府資助六十元，由創校開始至今，政府資助情況如何？

答：由 1927 年從謙學校正式列入為津貼學校，那時政府資助便是根據津貼學校的資助規則。在向教育署申請後，自行籌集百分之二十，而其餘百分之八十則由政府負責，但當時穀詒書院仍未上軌道，是屬於私校，政府只是津貼數十元，其餘便靠收學費，有些學生是真的交錢，有些則是交穀的，等同私校收取學費，但政府也會酌量津貼。

問：從謙學校在 1927 年成為新界首間津貼小學，成為津貼小學和以前書室在體制和資助方面是否有提升？

答：在 1924 年前依然是稱為「穀詒書室」，政府只是酌量津貼六十元，其餘的費用便由學校自行負責的。不論是堂費也好，捐助也好，直到 1927 年正式成為津貼學校，便根據教育署資助津貼學校的條例了。

問：從謙學校首任校長徐仁壽先生是華仁書院的創辦人，他在從謙學校的創立和發展上擔當甚麼角色？

答：徐仁壽先生是一位受過不少教育的人，他從五華來香港，也是由於姻親關係（他的姐姐嫁給了彭樂三），後來他在創辦華仁書院時說過，「華」代表他是五華人，「仁」是由自己的名字而來的，故書院命名為「華仁書院」。他從內地來港後先安定自己，找姐夫彭樂三，建了「石廬」。後來他為何當了華仁書院校長則不得而知，但是當時他在香港教育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所以便有機會申請到津貼。在 1927 年從謙學校正式成為津貼學校後，徐先生曾在本校擔任校長，由 1924 至 53 年間，約有十年擔任校長。彭樂三為校監，到了 1953 年，徐先生到南洋發展，懸空了校長一職，由另一位同鄉姓徐的暫代校長職務，但銜頭仍是主任，約為兩年。到了 1955 年，徐仁壽的次子徐

聲祥先生擔任校長，一直做到 1979 年才退休，做了約二十年左右。然後換了兩位校長便到本人接任，所以說從謙學校歷史悠久，但是擔任校長的人並不多。

問：徐聲祥先生還健在嗎？

答：他已不在了。他退休後便和女兒到了加拿大居住，後來中風，並於四、五年前離世了。他的哥哥在香港政府中是華人的最高職位，職銜名為副華民政務司。後來升職為勞工處處長，當時亦為從謙學校校監，但都已去世了。

問：彭朝仁先生是誰呢？

答：彭朝仁是彭樂三的兒子，當時他曾為傳道人，也是負責粉嶺區鄉事委員會。

問：他會否是新界姓彭的原居民呢？

答：不是，他也是從內地五華來港的，彭樂三先生也並非新界原居民。

問：歷任校監，校董是否和崇謙堂村或鄰近村落有淵源？

答：其實都沒有硬性規定的，例如以鳳溪學校為例，以前校長則必須是姓廖的自己人擔任，但現已逐漸開放。只是有能者居之，校董會認為適合的，便可擔任校長一職，而且教育署亦不允許這樣做（自己人壟斷），不能是內定的人選。在從謙學校中，以前曾有數任校長及校監與崇謙堂有關的，例如徐仁壽先生，徐贊賢先生（暫代校長），徐聲祥先生。

問：徐贊賢先生在此教了十年書嗎？他與徐仁壽先生有何關係？

答：他在此教了不止十年了。據本人所知，他和徐仁壽先生是沒有關係的，只是大家也姓徐，或者是內地同姓的，沒有姻親關係。接著的校長姓葉，是由老師晉升上的。之後是姓彭的，但和彭樂三沒有關係的，也是由老師升職上去，他退休後由本人接任。

反之校監則一直也由辦學團體的那群鄉紳擔任，那個團體名為聯安農村協會，後來註冊後便有一班會友，於 1956 年成立一間有限公司，所以這裡稱為從謙學校有限公司。校監曾由彭樂三先生、徐家祥先生擔任，之後是彭樂三次子彭朝安先生和徐仁壽的三子，現由彭朝仁之子擔任，以前的津貼學校校董只是同一團體的，但近十年則開放了，須包括老師代表，家長代表和舊生代表，但以前是沒有的。

問：開校初期以客家話教學的，那時來讀書的人是否以客家人為主的呢？

答：事實上全部都是客家人，包括內地來的，崇謙堂最近退休的那位湯少麟牧師也是用客家話講道的，基本上全村也是客家人，以前辦學的那群牧師、傳道人和鄉紳都是客家人，不論教學、談話均以客家話，後來大約至一九五幾年時不再用客家話教學，因為始終總有些學生未必懂客家話，那會不太方便，於是轉用廣東話。

問：崇謙堂村附近有沒有其他學校？

答：沒有，全部都沒有。所以欲求學的人遠至大埔、深圳、流水響和蓮塘尾都來從謙學校讀書，後來出現了兩所學校，一所在粉嶺圍，另一所在安樂村，名為「光下書室」較為高級，課程至高中程度，「光下書室」是以一種中學形

式教學，可以當作中學，但粉嶺圍的書室則屬於私塾，我忘記了創立的確切年代，但「光下書室」是較早期的，是一九二幾或三幾幾年，一定比從謙學校成立得遲，而粉嶺圍的書室則更後期才建立，也是彭氏建立，亦有姻親關係，他們認為反正自己的子姪也要讀書，有地方有能力的便在粉嶺圍的祠堂建校了，現在仍有保留著。

問：從地理上看，粉嶺鄰近上水，龍躍頭也有鄧族的，那麼他們有自己的學校？

答：沒有，龍躍頭沒有學校的，事實上從謙學校是北區、甚至更廣的地方中唯一一所學校，就算現在鄧氏有自己的學校名為「龍山學校」，但也因人數問題於去年關閉，應是一九五幾、六幾年才建的，因此早期讀書的機會真的不多，而且早期的人未必會想到讀書的重要性。

問：那麼龍躍頭鄧氏會來從謙學校讀書嗎？

答：有的，全部也會來這裡讀書的。

問：那麼上水鳳溪學校呢？

答：那時鳳溪學校尚未建立，比從謙遲，約為一九三幾年。

問：廖氏建立鳳溪學校，後期更提供中學教育，約為一九三幾年，那麼它會錄取崇謙堂村的村民去讀書嗎？

答：很少崇謙堂村的村民會去那兒讀小學的，這也涉及到本校學生的來源。那時交通不方便，雖然不用行山路，但由大埔，九龍坑等地步行到這裏也要一個多小時，由上水或流水響等地前來也要差不多一小時，需時不少。但由於附近沒有別的學校，故這些人逼於無奈也要長途跋涉來求學。但大多數學生都不會去別區讀書，因為乘車幾乎絕無僅有，較幸運的人可以踏單車，但相信為數不多。每天長途步行也不是辦法，所以最好要到附近讀書，社會及教育署的政策也是走這條路線。這也涉及村校生存和運作的情況，當時的政策是不希望小朋友走到那麼遠讀書，於是只要此處有足夠人數便建一所學校。學校可能面積很小，只有兩間課室，而且採用「複式」的教學模式，也就是說一班之中包括兩個級別的學生。即使現在在離島，鄉村等偏僻地方仍有這種複式教學。政府不希望學生山長水遠去讀書，可能涉及交通不便、家庭負擔等因素，因此當時有不少此類的小型學校，但漸漸地卻被一些規模較大的學校取代。

問：呂校長你是住在九龍坑的，那時你在什麼地方讀書呢？

答：當時我在九龍坑讀書，但該校因人數問題在幾年前關閉了。那時我由小學一年級到二年級也是讀複式的，到了四年級因為人數不足便跳級讀五年級，但也沒有辦法的。後來五年級讀了一陣子也不能讀了，便轉到大埔頭啟智學校。

問：那麼中學呢？

答：中學？即王肇枝中學創校的第二年，我於 1960 年 7 月小學畢業，轉到了九龍區上學。當時新界只有兩所學校，一所是鳳溪中學，但當時只提供初中課程，那麼往後又要找學校便十分麻煩。另一所是三育中學，但是這所學校不為人所熟悉，那時校址大約在現在省躬草堂附近，但其後被長江實業收購發

展私人屋苑，於是便在現址另建校舍作為賠償。那時另無他選，我便到了九龍塘讀書，由於交通仍不太方便，所以是挺辛苦的求學過程呢！

問：呂校長可否為我們介紹從謙學校的不同發展階段？

答：從謙學校不是分為太多階段。第一階段是書室之前，約為 1914 年至 1924 年之間，然後由 1924 年籌組津貼學校，直到 1927 年正式落成。其後到 1958 年，開始籌建擴校，是屬於第一期擴建校舍階段。到 1967 年啟用三樓校舍，直到現在都沒有大改變。

問：貴校分別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七十年代兩次擴建，這和貴校發展有何關係？

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擴建並非由於大戰問題。日本侵佔香港時，佔用了本校，以致學生停課，教員疏散。當時校舍用作憲兵部，造成很大的破壞，他們把足球場用作靶場，處決游擊隊。直到 1945 年和平之後，傳道人和村民又回到校園當中，當時有很多東西需要善後和重建的，所謂的重建實施旨在復修，並非擴建，正式的擴建是在 1959 年的。

問：從謙學校的學生來自甚麼地方和階層？這八十年間有沒有改變？

答：最初期二、三十年代，因沒有別的選擇，附近鄰村的學童便湧來讀書。後期約在六十年代後便多了許多農村學校，設備較為完整，但當時的農村學校對學校的規模沒有規定，有地方有資金便可以進行擴建。至於學生的來源，起初就從四面八方來。到後來根據教育署的政策，只要村內有相當的人口，便批准你建一間學校，那時學生便多在自己附近的村校讀書。不過那時亦有人因從謙學校歷史悠久，校舍寬闊而從較遠的地方前來讀書，由四十至七十年代新界村校的典型模式是紅色金字頂，分隔幾間課室，有一簷蓬讓人躲雨，但從謙學校已是一座規模相當的學校，不同於一般村校，便變得吸引些，及至聯和墟立為鎮後，便有更多人來讀書，這情況持續至八零年代，那時有許多屋 在新界落成，那是一棟獨立的建築物，不同於以前的天台學校，因此不少人便在村校就讀，相對來說，從謙學校的學生漸減，再加上附近幾條圍村人口減少：從鄉村可以看到很多變化，由五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有能力的男丁都望到外國工作，不欲耕田，到後期一點，為了方便工作，不少鄉村原居民搬往市區居住，本來村校的宗旨很清晰，是為本村附近的子弟提供教育，但子弟已搬出，去故學生來源便縮減了。幸好有不少屋 學生，當時屋 學校學位不足，從謙學校曾經試過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屋 ，例如華明 、上水天平 等，那時約為一九八幾至九零年左右，但自一九九零年至九六年期間，屋 學生也不足，直到一九九八年仍要面對學生不足的艱難時期，直至一九九八年放寬內地來港的規限，大約在二零零零年，從謙學校錄取了最多的新移民學生，而現在，在偏僻地區的村校學生有百分之九十八也是內地新移民，也有不少學生放學後需要回到內地，新移民湧現的情況持續至二零零三年，之後又漸減，現在更受出生率低的影響，村校的前景不樂觀。早幾十年前，沒有其他學校，學生被逼一定要到村校讀書。到八零年代，屋

學校學位不足，學生即使乘車也要到村校讀書。到現在，屋 已建了許多學校，有了更多的選擇，學生只要背上書包便可以到校上課，由於學校數量增加，設備完善，校舍整潔，因此村校的競爭力便會降低，逐漸被淘汰。

問：到了戰後，大陸解放時期，是否又有大批人湧來香港，使村校人數增加呢？

答：這個當然了！但學生人數增加不止是從謙學校。由於學童人數大幅增加，教育署便建了大批小型村校，又將一間學校分為上下午校以應付激增學童，半日制便由此開始。起初只是臨時建立這個制度，但卻一直沿用到現在。戰後和平，人們陸續回來，不論對工作及學位需求都很大，於是建立大量村校安置適齡兒童，現在欲殺村校的人認為村校已完成其歷史任務，有較新、較優質的學校讓家長選擇是絕對正常的，但村校是否就該如此棄掉呢？教育署署長的說話令人很不舒服，為何不可以說教育需要轉型呢？他一方面停辦村校，另一方面又在旁邊建立千禧學校，現在許多人都會質問其原因，他解釋說教育是要進步的，不能故步自封，給予學生家長自由去選擇，舊的學校便要淘汰。若站在社會經濟來說，似乎是無可厚非。但回想當時學位短缺時，村民鄉紳為建校都勞苦功高，盡心盡力，有求必應，也算是互惠，因是讓村裡子弟讀書。現在歷史任務完成了，要停辦也是正常，但問題是該如何安排或該用甚麼措詞才合適，他們說村校已落後要被淘汰，這話令人很難受。在大勢所趨下要結束村校大家都能理解，只是表達手法令人難受。近年來縮班老師也不會被安排好到他校任教，雖未至於自生自滅，但也不會刻意安排。因此現時教師心態也不太平穩，這是小學的情況，想必中學教師也會擔心這事，競爭太大了。

問：從謙學校有何特色？例如在校舍、課程、教職員和學生方面。

答：第一，這裡是村校，但不是村校的那種校舍形式，環境方面，這裡自成一角，不受汽車、工業的影響，即使附近的工業村也只是輕工業，與屋 小學不一樣，在假日需要開放籃球場等。

學生方面，鄉村小學的家長經濟能力和學術水平較低，照顧學童方面或許不及市區那些家長，老師必須留心多一點，但他們行為和操行則較為單純，有些曾於屋 學校任教的老師也認同我們的學生較單純。家長方面則甚少投訴，很尊重學校和老師。

課程方面則沒有甚麼特色，也是根據教統局正式頒佈的課程。

問：呂校長，據文獻記載，早在二十年代，在大埔錦山有一所師範學校，師範同學會中有一位校長撰文提及有關新界的教育，在戰前即一九二幾年至一九四一年，新界的學校仍是保持私塾的形式，那麼從謙學校在戰前的課程怎樣的呢？

答：從謙學校早期已甚有規模，辦學的那些人也曾接受過教育，故並非那種「單日誦經雙日讀史」的課程模式，出版於 1959 年的校刊中亦提及早期課程，於一九二幾年已懂得編制課程，範圍很廣，包括算術、國語、經學、地理，在當時來說已算很先進，和現在的課程分別不大，只是更改了名字而已。

問：那時為何修業期是四年的？

答：這事我就不太清楚了。曾經教育署頒佈為五年和七年小學課程，如「三三四學制」般，經過朝令夕改，最後仍是沿用六年制。

問：鄉村學校和新界的農業發展有沒有關係？

答：鄉村學校的建立一定與農業有關，於一九五幾年前人們生活困苦，即使你擁有大量土地也未必能賺到金錢，那時工業尚未發展，唯一生存方法便是發展農業，種植和畜牧行業在新界進行，於是聚集了一群村民農民，才會建立村校，這是直接的關係。

一九六零年後，農民由種禾轉為種菜種花，一九七幾年和八幾年，大陸開放，以致在港種植不及內地入口便宜，競爭力弱，於是農業式微，那時工業發展蓬勃，村民便往外面打工，發覺每天長途跋涉，舟車勞頓去上班也不是辦法，於是舉家搬往市區居住，令農村人口大減，所以在一九七幾年時我們是收取屋學童為主的。

問：現在很多村校面對艱難時期，呂校長認為是甚麼因素引致此局面？

答：其實「艱難」是在乎你怎樣看，在無可選擇時你也必需來讀書，試過一段時期學童和學校比例相等，那時彼此和睦相處，沒有衝突。後來人口漸減，必須淘汰過剩學校，環境設備較差的便要面對關閉，甚至現在興建的千禧學校，一級有五班，最舊式的村校只有一兩個課室，甚至有三級制和複式。這不是標準教育，例如在吉澳只有一班學生，卻包含四級不同的程度。標準學校是以一級四班制為主，但新式的千禧為五班制。所有村校的學生加起來也不能滿足一所千禧學校的需求，因而造成壟斷的情況，人口減少是最主要的因素引致村校的艱難時期。

問：您認為在以前和現在政府對於村校的態度有何分別？

答：政府常說村校資源不足，我們要改善優質教育，於是興建較好的學校，包含會議室、康樂室等，那麼對於條件不足的學校便會投放更多資源改善。這幾年政府不斷作出強調，無可否認，政府確實把大量資金放在教育上，以前的經費只靠一筆雜費（Class Grant），現在眾多的額外撥款並非單單放在村校發展上，是全港性增加，也流入市區學校。明顯地，未達標準的學校將會逐步被取代。

問：戰後人口激增，又有嬰兒潮，又有大批難民湧入，當時政府請求鄉村幫助，是怎樣請求的呢？

答：照我估計應是一九五幾至六幾年左右，學位不足，市民便去投訴，政府也必須安置這批學童，於是政府向村中的辦學團體和鄉紳反映，實際上也是互惠的，是雙贏局面，我相信是彼此洽商而成的，但那時是政府主動請村校辦學，那時在市區也有天台學校的出現。

問：呂校長你於何時在從謙學校任教的？剛在羅富國師範學校畢業便來這裡教書嗎？

答：是的，1967年我一畢業便在此教書。

問：在從謙學校有老師也是在鄉村師範，或是更早期的埔師畢業的嗎？人數多嗎？

答：從謙學校的老師分為幾種，因為當時老師資格並無特定標準。其中一批是在內地讀書的知識分子，非教書出身，是乙級教師，薪金約為百多元，薪金是固定的。而甲級教師薪金則為三百多元，根據正式的教師編制，乙級教師修讀有關師範班或是教授滿十年，校董會便可推薦其變成甲級教師。另一批老師是來自鄉村師範學校，這是屬於較後期的師範學校，較早期的埔師本來從大埔錦山遷徒至邊境附近，成為正式的鄉村師範學校。後來辦學七年又併入葛量洪教育學院，本校中也曾有一兩名老師畢業於此。

問：以前的鄉村師範需修讀農科園藝，是否和村校教育有關呢？

答：我相信是絕對有關的，這並非村校師範的問題，小學會考也有「農業常識」這一科，相信是因應社會需要才設立這一科。

問：這一科目開設至何時呢？

答：很快便沒有了，大約在六零年代尾便沒有了。

問：這和香港農業發展有關嗎？

答：我自己也住在農村，每個季節的農業工作也十分清晰。我讀中學之後，即 1962 至 63 年左右，種禾開始式微，種菜便開始興盛起來，種禾在現在已經絕無僅有，在香港出產的米，其實只夠香港人一日食用，事實上少之又少。倘若沒有外國米輸入，根本不能維持，因此本地農業便開始式微。

問：那麼新界種菜又維持到何時呢？

答：在大陸開放之前，香港種菜仍然很多。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大陸輸入的菜開始增多。到八十年代尾，香港人甚至到內地開設農場和菜場，聘用內地的工人工作，因此香港便失去競爭力。初期香港還可以以廉價去吸引顧客，但慢慢發展起來，已失去這個優勢。

問：其實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農業，那為甚麼在六十年代又會廢除農業常識一科呢？

答：我相信這是需求的問題。當時課室是由教育署去編定，但學校校長亦可修改課程，其實當時有許多其他的科目，如美勞及健康教育等，課程多了便會分配不均。加上，六零年代亦開始有工業化，學生寧願讀經濟及公共事務科也不修讀農業常識一科，因此便被廢除。

溫萬儀老師訪問紀錄

日期：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二日

時間：下午四時

地點：從謙學校圖書館

溫萬儀老師是從謙學校的舊生，亦是從謙學校的老師。她小學畢業後在粉嶺心誠中學唸書，後來舉家移民英國，大學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SOAS）唸中國歷史。其實溫老師醉心中國文學，於 97 年回流香港，後來更放棄在高等法院任職翻譯的工作機會，返回母校任教至今。

問：溫老師，請問你何時從從謙畢業？

答：大約是 68 年畢業，在這裏讀了 6 年。

問：溫老師，你是否崇謙堂村的人？

答：我不是崇謙堂村人，我們那條村很特別，是自己為自己村命名，叫皇后村，因為後面是皇后山兵房。其實我是在祠堂村出世，在龍躍頭再遠些，有個祠堂村，出生後第二年全家搬了去皇后村，並買田耕種。山邊有間石屋，但那裏原本沒有村名，因為在皇后山兵房後面，故稱為皇后村，現在仍有三四戶人家。

問：溫老師，你是否新界原居民？

答：對，我是新界原居民。我阿公在沙頭角榕樹滘出世。我們大約住了十多年，根據族譜，我們的祖先是解建康之圍的溫橋，是標騎將軍的後人。族譜是這樣寫，不知是否屬實。他因此立大功，救了皇帝，就委派他的兒子任廣東刺史，全家就搬來這裏了，後來改朝換代就到漁村去了。在那裏至少有 18 代，在沙頭角附近。後來，那裏生活比較貧苦，捱飢抵餓，我阿公就搬離這裏。我初來時，年紀還小，這裏（粉嶺）全都是石屋，沒有工廠區，我去了英國後才有工廠區。

問：溫老師，你們家說什麼方言的？

答：我們說客家話。其實這裏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圍村的五大家族只佔少數。由沙頭角，一直到粉嶺大埔，全部都是客家人。在錦田、元朗、上水才有多些圍村人。但是香港歷史寫的多數有關圍村人，抹殺了客家人的歷史。

問：是否因為圍村人來得比較早？

答：不是，其實是因為那些研究歷史的人，不懂說客家話。因為我看香港歷史，很少中國人研究香港歷史，多為外國人研究的，他們不懂說客家話，就找些懂廣東話翻譯的人到圍村找資料，所以就沒有客家人的歷史。

問：現在漸漸多了些（研究客家歷史）？

答：不，現在漸漸少了。許多客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現在的歷史都不完整，之前的歷史是因為外國人不懂客家話就淹沒了客家人的歷史。譬如我讀書的時候，我學校差不多九成是客家人，但是沒有人說客家話，我的同學都

怕說客家話，因為戰後香港經濟太繁榮，人們通常喜歡到外面打工，逐漸沒有人耕田，全都出去做工廠，在我同學的意識裏覺得客家人落後，所以就不敢承認自己為客家人。像我外婆那一代，她生的子女都不再講客家話，也不知道自己媽媽、爸爸是客家人，所以好多香港的客家人都是自己是客家人。因此許多人都認為香港歷史都不完整。如果你有興趣都可以去發掘下。

問：溫老師，當時你同學會不會多數是崇謙堂村人？或是會有外地人？

答：多數是附近村的人，我們稱為五圍十六村，就不是崇謙堂村，崇謙堂村是很細的地方。

問：那麼五圍十六村在那裏？

答：五圍十六村：老圍，觀龍圍，東閣圍，永明圍，麻笏圍，村就如小坑村，新村。五圍六村才對，祠堂村。還有3個村，但忘記了。

問：那麼五圍六村是客家人嗎？

答：有，他們稱為圍頭人，亦都有客家人，亦都有本地人。當時情況比較特殊，我十多去了英國，去到九七年先回來，我腦海中的新界，如粉嶺，大埔和現在很不同，我以前好喜歡大埔，以前坐那些火車。以前的火車好高大的，上面有幾個風扇。我腦海中的新界是這樣的，所以回來後好不習慣，九年來都不習慣。

問：溫老師，我想問，除了從謙學校，當時區內會不會有其它學校？

答：有，在我那個年代，已經有龍山。龍山有四十多年歷史，也有培靈。我印象最深刻是粉官，培靈，龍山，從謙，以及沙頭角有間沙官小學和鳳溪。

問：北區只是有那麼多？

答：是，所以當時小學不多的。但我讀書的時候還未有九年免費教育，所以，我讀書時，有好多人無書讀。

問：你提到五圍六村有圍頭人，有客家人，是否從謙有90%客家人？

答：點解？其實從謙的起源好得意，同聯和墟的起源都有些相似。當時，我們民族意識比較狹窄。圍頭人和客家人就不妥協。我們當時買菜還未有聯和墟，在石湖墟買。我媽媽不是日日都買菜，和現在不同，因為他們要耕田，常常在田到工作，通常一個星期至一個月才會去一、兩次墟，有收成會擔去賣，他們會步行去石湖墟。石湖墟大部分多是圍頭人，亦都有些本地人，因為可能住近內地，他們和客家人語言不同，其實民族之間主要是因語言（隔閡）所以才有衝突。語言不同時有好多爭執，同埋那些客家人常常覺得那些本地人欺騙他們，所以他們建立聯和墟給客家人。另外建學校給客家子弟讀書。以前學校初建的時候大多是私塾，觀龍圍亦有書房，禾坑有個述善書室，是秀才公建的。主要是村內的父老覺得要子弟讀書，所以建個書房仔。其實從謙起源都是這樣的。因為幾個牧師·從內地來到此地，跑到這裏覺得環境不錯，就在這裏傳道。但是他們有子女，他們很著重教育，他們又說客家話，全部都說客家話。當時教室當然是說客家話，他們就想辦學校給客家子弟讀

書，就建了穀詒書室，然後就聚埋一班小朋友讀書。

問：溫老師，你提過有粉官、沙官？

答：我讀書的年代了，但是之前這裏建築的時候應該沒有這麼多的。

問：是用客家話教學的嗎？

答：我讀書時候已經不是客家話教了。

問：不是客家話，但是客家人佔多數？

答：正確。當時從謙的聲望好厲害的。當年學生是排隊來從謙讀書，因為師資比其它學校一定好。我們當年建校的時候，多是從內地來的。他們本身都係跟秀才讀書，一到戰後，好多國民黨的元老來了，有幾個國民黨（元老）在內地都認識，如羅香林，凌道揚。凌道揚以前是國民黨大官，中日戰爭一完結，接著是打內戰。國民黨官員，有些來了香港，其實當時有很多個都是在粉嶺落腳。但他們在粉嶺時，香港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學歷，他們亦未必願意為港英政府打工，所以些人不知做什麼，所以就教書。從謙學校當時的師資是好好的。

問：你提及的是你讀書時或是戰後？

答：戰後時期，到五十年代，所以那時就好多人到從謙讀書。當時開始因為從謙註冊了冊，就改了是廣東話教學，因為一經註冊，就一定要跟英國政府的規則辦事。

問：請問何時註冊？

答：應該是五三年。要查文獻才知道。但是在新界就第一間註冊的津貼小學，即是整個新界第一間，所以個編號係 001。

問：五十年代註冊？

答：應該是五十年代。

問：但是二十年代已經有津貼？

答：真的嗎？我們是新界的一間津貼小學。正式註冊就要查查。

問：溫老師，其實我地找到一九一幾年教署年報，用的是 Tsung Am？

答：一九二四年搬了上來，一九二四年之前就在下面的穀詒書室，就不是正式註冊，可能落了名。因為當時，崇謙堂好多人在政府打工，所以好多聯絡，他們有時都在下面作做統計。一九一三年，穀詒書室開始，一九二四年後搬了上這裏。一九二五年，教育司主持揭幕，當時有可能未註冊。但是可能入了政府私立小學。

問：政府會選擇一些優質的私立小學，每年會有一年一百二十元的津貼。

答：當時應該是好優質。因為我看舊一本的年報，當時個柯司憲，他參觀我們學校，覺得我們學校師資優良，學生成績又優良，所以捐了錢與我們作獎學金。

所以當時校譽是好的，不止這裏的人來讀書，連沙頭角人都步行來讀書，

問：步行至此需用多少時間？

答：一小時左右。

問：這麼快便可以步行至此？

答：不遠的，我們駕車去（沙頭角）都是好近。我自己讀中學都是步行到心誠上課，我都是早上行四十五分鐘，所以步行四十五分鐘不是大事。

問，溫老師，當時本地人會在龍山讀書？

答：大部分。姓廖會去鳳溪。但是這邊還有東閣圍、老圍，多數去龍山。他本來是私塾，後來見我們開（學校），他們又在龍山開。所以當時好明顯分出界限就是從謙是客家人學校，那裏是圍頭人教。其實，現在可能覺得好多餘，但當時的氣候是這樣的，因為語言不同。我外婆、我媽媽那代人好多人未讀書，真的不懂說廣東話，故此有好多衝突、誤解出現。所以，當時分得幾清楚。現在就沒有了，全部都是香港人，沒有分什麼客家人、本地人，以前就分得好清楚。

問：溫老師，我想問當時村內的人或鄰近客家人都會選擇從謙學校讀書，是因為什麼？

答：因為大家有介紹，以及當時好多客家人已經是教徒。

問：我發覺五十年代徐聲祥個位校長本身學歷好高。

答：何止，他與政府關係好密切。出面學校對政府行政不懂，但是因為徐聲祥是「英文人」，所以他們對政府的資訊較為先進，他什麼都知道過人，所以學校裏面又有童軍，我們是新界第一個 set up，女童軍是第 5 旅，現在男童軍沒有了。所以有什麼節慶，來的多數是西人官員，當時在新界地方就覺得好高檔。

問：當時區內交通情況怎樣？

答：交通就沒，因為當時無交通可言，連車都無到，以前即使在聯和墟都不是那麼多車，多數人踏單車。

問：溫老師，沙頭角的人步行來，你本身又係皇后村步行來，其他人都步行來。當時粉嶺區交通以致市區交通相比是？

答：同現在差很遠。以前只有巴士。以前我讀書時是沒有小巴，好多地方連馬路都無，我們入村都係行小路，交通工具只有單車。後來為什麼發展成工業區，我自己沒有正式做過考察。但我記得差不多讀到 6 年級時，就有好多安樂村的人家在民居裏做毛衣加工：當時開始好多人去英國，民居好多是空了的，又近聯和墟，入面無馬路，這裏近聯和墟就有少許馬路，就租與家庭做生意，自己安裝幾頭衣車，就周圍招募女仔，可以車衣服，車手袋，手套，逐漸多了許多這樣的。後來，我去了外國後，回來，怎樣形成工業區我就知道了，但是開始時有手工業。

問：溫老師，即是話，以前粉嶺區內以致對外的交通與現在相比起就落後很多？

答：落後許多。

問：例如班次，如區內巴士班次多不多？

答：並不多。

問：有邊幾條線去那些地方？

答：有得去沙頭角。

問：大埔？

答：有，當時有車去大埔，有車去沙頭角，但不是那麼繁榮。

問：怎樣不繁榮？

答：即是早上墟期便有很多人。因為當時粉嶺和聯和墟，一，不近火車站，二，唯一多人來往就是沙頭角通道。當時沙頭角還有中英街，所以去沙頭角緊經過粉嶺、聯和墟。所有車都在聯和墟停，故此帶旺了這一帶。

問：當時會不會有好像現在的專線小巴在整個區內四通八達？

答：沒有！

問：只是靠巴士？

答：以前有巴士，但我們多數步行。

問：為什麼不坐巴士？

答：車都不是直接去到火車站，火車站行出來一大條路是餐廳。我記得當時第一次聽過什麼為神戶牛柳，但是很貴，沒有錢去食。有雅閣餐廳，我忘記了何時開始沒有了，我回來時已經沒有了。我記得當時粉嶺火車站有間小屋，門口有個小亭，有個 check 火車票的人，他會出來找個東西來夾下個火車票，硬卡紙來的。

問：硬卡紙，好像那些小小的巴士車票，但是，我的朋友……我就沒有那麼大膽了，因為我很少到市區，但是我所認識的男孩比較野性，整天在火車路軌上嬉戲，那時火車班次較少，需時較長，不像現在電氣化火車般危險，以前一小時一班火車，於是常常在火車軌上玩樂。有時需乘火車，他們就在火車軌上追逐，火車來到時便爬上外露的地方，那麼便不用購票了。你們這年代的年輕人又怎能想像得到了？所以那麼交通並不頻繁，而且粉嶺火車站較簡陋，只是一間小屋。火車站外是又斜又長的路，也就是現在的消防局那位置，到了迴旋處，兩旁有不少小屋，有些餐廳。

問：那時的火車是每半小時一班嗎？

答：大約半小時至五十分鐘吧！

問：有巴士到市區的嗎？

答：有，但是班次不頻密，許久才一班。

問：區內有巴士來往穿梭的嗎？

答：不是的。那時火車站附近都是菜田，沒有房屋，聯和墟一帶的樓房還未興建好，只有舊街市，其他都是田，種植各類的蔬菜。以前內地沒有什麼蔬菜運來，全是靠新界供應的。直到粉嶺迴旋處，法院那邊都是田。祥華村、嘉福村還未建好呢！

問：那麼步行便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嗎？

答：對，還有騎自行車呢。

問：如果再早些，連自行車也沒有，單靠步行嗎？

答：對！那時我媽媽種田時，他們擔著收割了的禾，一直走到沙頭角賣。連到廣州也是步行的，聽我爸爸說，在我外公的年代好多人失學，這裏的人想讀書

便需走到廣州求學。

問 六零年代只有火車到市區嗎？

答：對了！

問：有多少條巴士線往沙頭角？

答：有，但不知確實有多少條路線。

問：會經過粉嶺的嗎？

答：我不知道，只知有巴士而已，還有一種 truck (貨車)。後面有塊帆布蓋著，兩旁放兩張長椅，我們便是乘搭這種車到沙頭角的。

問：我都是坐那些車。

答：現在就沒有人用那些貨車了。我小時候也坐過兩、三次。

問：會不會因為當時交通不便利，所以當時新界鄉村的小朋友都是在村內就讀而不是到外邊的學校讀書？

答：沒有，中學才會（到外邊讀書）。我小時候讀書很悽慘，當時政府要求小學會考，學校不多，只是有一間官立中學，上水就有鳳溪，粉嶺有粉官，大埔有王肇枝，只得三間。但是我們若想入中學，要經過小學會考才可以派位。我記得當時（上、下午）有四班一年級，每班四十五人，但只有十人可以參加小學會考，還要在四年級開始選拔，那十個同學就是精英班。那麼其他學生就算成績如何高，也沒有機會參加小學會考。第一，讀完小學已經可以做工廠，第二，你可以選擇私立學校。通常家庭都不期望子女有高學歷，小學畢業就已經很好。我姐姐想讀中學便要自己考，因為她不能考會考，只能夠到九龍讀書。當時我們從家中走到火車站需時四十五分鐘，若不能趕上火車，便要等待半小時。當時火車由粉嶺去到旺角站需要一個小時，所以我姐姐要早上五時起床摸黑出門口，到了晚上8時才回到家中。就算如何辛苦都要堅持讀書。所以現右回到此校任教，我協助同學選擇中學時會很生氣，因為他們寧願選擇一間較近的中學，亦不選擇一間較遠但是較好的中學。

問：溫老師，請問你當時有沒有考小學會考？

答：沒有。因為當時的班主任很偏心，他只選了一些自己喜歡的學生，還有他自己的兒子、校董的兒子、校監的女兒等，這樣我便沒有被選中了。結果，因為想讀書，所以一定要報讀私校，但是學費太貴了，要四十元，當時官校只需一年四至五元，而從謙學費只需4元。所以我阿婆不願意讓我去讀書，她認為鄉村女孩不需要讀這麼多書。但是我卻堅決要讀書，她才讓我去考附近的中學，所以我去了考心誠。很奇怪，我剛剛考完，那老師便讓我交學費了。兩年後，爸爸便申請了我們一家移民英國。因為那時英國移民局要修繫法例，若再不移民到英國，就會很困難了，結果全家一同移民到英國。

問：溫老師，請問是否到了六幾年的小學六年級都有四班，但只是十個學生可以報考會考？

答：是。但是到我畢業後便改革了，大部分學生都可以考會考了。

問：當時又有多少個班房？

答：也是一樣，到我讀六年級時好像有十四個班房。

問：如果每級 4 班，就即是二十四班，是否分為上下午班？

答：是。

問：是否上午兩班，下午兩班？

答：是。

問：是否也是得十個學生可以小學會考？

答：我讀書時都是只有十個人會考，名為精英班，每個星期六還要回校補習，但是我們就沒有。當時上美勞堂，我們要種花，他們十個就如寶貝，只是澆水而已。但是，每次考試，他們的成績一定比我們還要好，所以我覺得我不公平。我記得我班主任個兒子成績比我還要差，但是可以會考，而我就沒有，真是不公平。

問：溫老師，你讀書時開設了什麼科目，同現在的又有什麼不同？

答：並實是有的，常識都變了很多。而且當時很注重公民教育，現在就比較知識性。但是現在政府做了這方面的工作。當時我們的德育很嚴謹的，要求很高。現在就注重多了分數。那時有生活技能學，教你好多勞作，而且當時不需要考試。

問：有什麼生活技能呢？

答：有木工等。

問：溫老師，請問當時有多少科目？

答：真係忘記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珠算，尺牘，現在就沒有了。當時尺牘好重要的，寫信格式、禮貌都好重要。

問：可有科目同農業有關係？

答：我們會在美勞堂種花、種菜，其他就不是那麼清晰。我們在學校的地方種，很美麗的，現在比起當時差得很遠。當時校長很喜歡園藝，有溫室，而且很有計劃，有筆記，樣樣都計得好詳細，好清晰。

問：請問收成有何用途？

答：他每年也參加園藝比賽，多年來也是冠軍。當時學校的花園真是好美，在我眼中，無論何時校園周圍都是花。相比現在，那時真的很美麗。現在負責的老師不太喜歡花，所以只種了一些色澤較為沉悶的植物。

問：溫老師，請問當時課程和現在有什麼分別呢？

答：大致上沒有分別，因為當年徐校長都是在市區讀書，在港大畢業，都算半個城市人。我看過徐家祥的回憶錄，他說二幾、三幾年時從謙已經有英文課本，同外面那些小學也一樣。因為他父親，徐仁壽先生，是華仁書院創辦人之一，後來徐家祥在從謙讀了兩年便轉到華仁書院讀書了。他說到因為當時從謙所用的書本和外面差不多，所以他在銜接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問：溫老師，我想問，因為呂校長先前都提及過有複式教學，那麼你讀書時有沒有複式教學呢？

答：沒有。因為我們人數多。每班都很多人，最多有四十六，四十七人。所以我

們讀書時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問：溫老師，你提及過粉嶺區有很多學校，那麼他們的收生率有沒有從謙那麼高？

答：我相信初初沒有那麼多，因為龍山始終比較偏遠，以及形象方面也沒有從謙那般先進。而從謙形象則先進，因為徐校長，很多事情也是用英文。當時人們覺得用英文就好利害。從謙亦有很多課外活動，常常奪冠，所以收生率很高，陸陸續續有人搬來讀書。

問：搬到那裏？

答：即是聯和墟那些居民，市區來的也喜歡在這裏讀書。

問：那麼龍躍頭的小朋友呢？

答：其實龍山比較落後了。

問：那麼龍躍頭的居民多數會到那裏讀書？

答：多數去龍山讀書。當時有些民族意識，感覺上，客家人比較拼博，所以他們說客家為佔地主。當時圍頭人陸陸續續賣祖業，進取性不太強。所以，他們不喜歡讀書。

問：溫老師，當時學校好多都有課外活動，當時你又有沒有參加學校的課外活動？

答：有。我參加了童軍。

問：有沒有其它種類呢？多不多呢？

答：都有，有歌詠團，有興趣組，針指，園藝。我記得我那些家姐，妹妹都有參加童軍，而且有幾多活動，多數在課餘時間參與。

問：村校在課餘時間與市區有什麼分別？

答：有。個個學生放學後都要回家做家務，而市區的學童就不用到田裏幫忙。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小朋友要幫手做家務，以及幫手賺外快，很多人會做手工藝，幫補家用，也會再手工廠做 part-time。

問：溫老師，我想知當時新界農村生活與市區生活有什麼不同？

答：有很大的分別。當時鄉村小朋友比較窮，沒有鞋穿，周山玩。因為當時家中尚未有電器，我們便燒草，那些山頭全是草。而我們的零食也是來自山上的植物，如石榴等。後來，村內男士大多到市區工廠打工，剩下了婦女，老人和小孩，所以村內都很太平。

問：村校生活和作息方面有何特色？

答：有暑假，寒假，可能沒有現在那麼多。

問：那麼作息時間方面有什麼不同？

答：沒有什麼特別不同。

問：溫老師，市區學校的課外活動與從謙相比有何不同呢？

答：我覺得大致上沒有不同，市區主要是受場地的限制。其實鄉村都不是那麼多地方和時間，因為小朋友放學後便要回家做家務，沒有空留在學生參與活動。

問：當時需要協助種田嗎？

答：要，我也有幫忙。

問：是否上午上學，下午幫助家務？

答：是，種田。但是當讀到高小時，新界（經濟）氣候開始變了，但與村校沒有關係，只是社會經濟環境轉變。當時我讀小學時，已經有大米進口，這使很多人失業，移民外國去了。

問：若要協助種田，放學後要做些什麼工作？

答：如果係播種期間，我們要播種，唯一不用我們耘田。平時要耘田時，小朋友齊齊落田，用腳把雜草踏回泥內，防止其重生。又要插秧，插秧好得意。其實耕田很辛苦，只有小朋友才覺得開心。但當自己是大人後，才知道很辛苦。小朋友最辛苦的工作，是要負責曬穀。6月天時，日光很曬，屋前有個名為禾亭的地方，用來曬穀。我們要在很熱的地上，把那些穀刮一刮。事後，兩隻腳板都腫了。

問：怎樣刮？

答：即時用腳撩開穀子。禾亭面積不太大，只是兩個課室大小。我們用雙腳把穀子攤開，讓它們表面均勻曬乾，因為它們有毛刺，令我們雙腳十分狼瘡，而且會紅紅腫腫。

問：耘田是否每天也要做？

答：不用，好像只是每季做兩、三次。首先播種，然後秧苗就會生得很密。人們接著會把秧苗割到好像草皮那般，再把割好的秧苗放到秧盤中。當我們插秧的時候，大人會幫我們把秧苗分開。但分開之後，有些野草會在中間的空位生長，到了適當時，我們會用腳把野草踏入泥中，這便是耘田。當我們把腳縮回來時，會有很多水蛭黏在腳上。

問：在農忙時，會不會有些小孩子缺課？

答：是的。因為農忙是很重要的。收割要在一星期之內做好，最好就三至四天內。所以我們稱此為 intensive farming。其實在播完種，插完秧之後，有一段時間是很清閒的。但一到收割期就會好緊張。若果不在穀子熟透之前收割，穀就會掉在地上，之後雀鳥會來吃，這就等於損失慘重。不過，你又不能在那段時間請人幫手收割，因為人人都在那時收割。穀子是一起成熟的，陽光也是普照所有田地，大家是公平的。有些家庭因為少人，所以不能完全地把禾收割回來，穀子掉下被雀鳥吃掉就有損失了。所以，收割期是非常緊張的，家家都會全家總動員，只要有人手都要幫忙。

問：農忙時學校有沒有為耕作而特定的假期？

答：農忙時，我們都好悽涼的。有些同學會請假。其實當時我們是沒有課程緊張的，大部分學生都只想識字認字而已。不會好像現在那般，要應付甚麼考試，要拿多少 banding。所以，學生不上學就不上學，全部都請假去種禾。我們以前上學非常舒服的嘛。

問：一年有多少次農忙？

答：一年兩次。

問：那時學生是否要請假回家幫忙收割？

答：到我是小孩子的時候，收割期已經沒那麼緊張了，因為當時沒太多人種禾。

記憶中，農忙時的飯菜就有不同。其實我們吃得很清淡，但一到收割期，菜就非常豐富。（農和農之間存在合作關係，）若果菜不豐富，人們就不會幫助你。他們就像搶穀那樣，割完這塊就割第二塊。當時鄉村人吃的都不是好伙食，所以哪家人有燒鴨，就幫哪家收割先。所以，一到收割期，家家都有肉吃。但我們小孩子是沒得吃的，只可以拿著飯碗坐在禾亭看大人吃。

問：溫老師，你自己就沒有親身經歷，那你有沒有看到過同學幫手割禾？

答：不，我也有幫手，但有沒有請假就真是不記得了。好像沒那麼緊張，多數都是大人收割的。記得一放學就去幫手收禾草。

問：小孩子收禾草？

答：我讀書時是挺適齡的，但我有很多同學都是超齡的。尤其比我早幾屆，就有很多超齡生。我們的校董雷先生，以前在廣州來的，他來到新界在鄉師讀，第一日就派來我們學校教，他說班上面有同學年紀比他還要大。小學生的年紀比老師大呢。他應該是在二十一歲畢業，出來教書的。

問：請問雷先生是…？

答：雷達貫先生。他口中的年紀比他大的同學要請假。當時，父母都不會要求我們小孩子請假，但放學後要去幫忙擔禾草。

問：男孩子會不會請假？或是比較高的那些？

答：不會。當時男孩子是賣來的，不用做，只有女孩做。我們在忙的時候，我弟弟都會去河邊捉魚仔的。大人都當男孩子如珠如寶的。

問：那是否有同學會請假？

答：應該有，但我真是不太記得了。我班有幾個同學比我大很多年，我記得都有超齡生的，但就開始沒那麼多了。之前真的有很多超齡生，因為他們都未讀過書，都想識字認字。

問：溫老師，你記不記得當時老師多數是哪裡畢業？

答：當時有很多老師都不是正式師範畢業的，也有很多以前是由內地來的。他們執教了一段長時間後，就會註冊。

問：呂校長曾經說過，教書達十年，校董會推薦的。

答：是的。但有些都是師範的，並不是全部，一半半而已。我讀書時的老師都是教了很久的，有幾個印象特別深刻。第一個是徐贊賢，他以前由五華來的，他的中國文化很厲害，我十分喜歡上他的課，但他並不是香港師範畢業的，因為香港師範畢業的老師都陸續走出去了。另一個是阮品強，他現時是香港西區議員，上過報紙的，弄得滿城風雨，他是教音樂的。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朱倓老師，因為她是說普通話的，在學校教了有二十年左右，應該在戰後來的，教到65-66年就退休，我覺得說普通話的人中文一定很厲害，好有學問。她有教我姊姊，姊姊都說她很棒，所以，我希望她可以教我。但當我升上高班時，她就退休了，沒有教到我。另有也有幾個老師對我有很深的影響。陳家創老師是其中一位，他是教英文的，他的英文十

分好，又用很多活動、圖片來教我們。他的教法令我非常感動，他是十分關心我們每一個人，而且真是會稱讚我們。我最記得，在我讀二年級的時間，我畫了一幅畫，他就讚我畫得好。其實我是在畫一隻雞公，因為我家有養雞，自然對雞公、雞仔非常熟悉。他除了稱讚我之前，還把我的畫貼堂。我覺得自己很棒，很有畫畫的天才。於是，到了現在，我仍十分喜歡畫畫。但那幅畫已經不見了，我覺得這與畢加索的畫有點像呢！他說英文真的很動聽，有高低音，很像外國人講英文一樣，但是我們卻不敢說，但他時常讓我們向全班同學說英文，所以我覺我他做事十分認真，而且他很疼愛我，即使我不交功課，也不責罵我，只在功課後寫上幾句鼓勵性說話，但他卻責罵其他學生，其後我便準時交功課與他了。

問：為什麼六十年代會有那麼多在師範畢業的老師？

答：因為當時舊一批的老師開始退休了。

問：那麼村校學生升學方面與市區的學生有沒有分別？

答：我認為有。鄉村的家庭始終不注重學生讀書，沒有讀書的傳統，而且當時很流行移民外國，所以他們覺得讀書沒用，始終也是要移民外國。相反，市區學生的出路與我們截然不同，他們認為要有一份好工作，讀書就是唯一出路，所以係家庭壓力和鼓勵的動力相對起鄉村，真的較為強。

問：會否是制度上令學生升學機會較少？

答：是。

問：在學校選擇方面，會否比市區還要多呢？

答：我相信會是。雖然不清楚當時的制度，但因為沒有機會會考，所以覺得不甚公平。而且學生的家長也不緊張學生能不能會考，認為不一定需要升上中學。再者，當時村內亦不希望女子能升上中學，只希望女孩子能小學畢業後工作，賺取金錢，報答父親。當時風氣是這樣的，認為十一、二歲能嫁，便是上等人家；十三、四歲才嫁，便是中等人家；十七、八歲也嫁不了人家，便是下等人家。所以小學畢業後，工作兩年，便要嫁人家了。

問：若你當時真的要工作，是否會到工廠？

答：我有不少同學也到工廠工作，並不奇怪。

問：那些工廠會在那裏？

答：工廠會在九龍，深水。

問：那麼他們會住在那裏，還是新界？

答：不是。以我舅舅為例，他租了一個頂樓連天台做工廠，在天台建了一間鐵皮屋，裏面只有一些工作，到了晚上女工便在 上睡覺。

問：是否以寄宿的方式進行？

答：是，那張工作 就是床子了，而且一個月只放兩日假，初一、十五，每逢放假，他們都會回家探父母。

問：當時七、八十年代，工作年齡應該是十四歲，為什麼他們畢業後可到工廠工作？

答：他們未必十二歲才畢業，有些人比較遲入學，畢業後便夠十四歲。

問：會否有人未夠年齡便到工廠工作？

答：有，男孩較為多，有些十一歲便開始工作，例如到酒樓工作。當時聯和墟有一間宏天酒家，我的弟弟也在那兒工作，但他只是愛玩耍。他賺了金錢不是用來買什麼，而是用來報讀函授學校，學製無線收音機。當時學校課程沒有太大壓力。

問：那麼在這十年，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變化？

答：當然有。當時在我們眼中，從謙是第一的，但現在的香港人卻覺得鄉村學校很落後。那時的我很喜歡鄉村地方，一想起市區就會很頭痛。那時在我海中的市區是個不好的地方，人們很勞碌，環境又差；相反，鄉村卻是一個安居樂業，人情味濃厚，人人開心見誠的地方。但是現在的鄉村人情味已沒有了，人情冷漠，而且再沒有人耕田；相反，市區卻變得有一種繁榮、高檔的感覺。

問：那麼當時有什麼驅使你回香港呢？

答：其實我年年都想回港，但是卻多受次受到阻撓。而且我受到小學老師的影響。我對朱倓老師的印象很深，覺得她語文很強。我好喜歡種田的生活，又開始接觸詩詞，小學開始，我已經讀詩詞了，如李後主。因為當時沒有地方好玩，所以我便看書作消遣，通俗小說，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等。我十分喜歡中國文化，就不願到英國。到了那裏，我不喜歡當地生活，常常想回來。直到九七年，我賣了那邊的物業，決心回來。

問：溫老師，你一回到香港就在從謙任教嗎？

答：不是。回到香港找工作，因為我覺得從謙風景好美麗，而且我亦喜愛小朋友，所以我就寫了求職信給校長，但石沉大海了，所以就去找新的工作，結果去了能仁書院任教。一年後，我已經再沒有興趣在那裏任教，所以沒有同校方簽約。到了八月，之前我申請了做公務員，法庭就寫信去請我，在高等法院當翻譯。但收信後幾日，從謙致電給我，請我任教兩班新移民學生，我便答應了。

問：今日真的多謝溫老師接受訪問。

答：不用客氣。

羅慧燕博士訪問紀錄

日期：二〇〇六年五月二日

時間：下午四時

地點：香港教育學院

羅慧燕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講師，現正進行一項有關香港鄉村教育的研究，對鄉村教育發展有深入研究。

問：長久以來香港政府在小學教育的政策上，對市區和鄉村小學，是否有不同的取態？

答：應該是有點不同。在課程上，村校有些科目是市區學校所沒有的，因為 60 年代的鄉村仍是農業社會，以務農為主，所以仍有農常一科教學生去種菜。此外，師資的培訓亦有不同，以前有一間鄉村師範學校，專門培訓老師去服務村校。所以，培訓師資的機構是有少許分別。對於一些新界比較偏遠的地方，因為沒太多老師願意去，政府就會加一點薪酬去鼓勵老師到偏遠的地方教書。這也是市區內未必會有的。嗯…可能比較敏感，因為新界始終接近大陸，處理鄉村事務或新界教育與政治有些關係。但政府一直以來對教育也不太積極，只是一種放任政策，有問題才解決。其實整個香港的管治也是這樣。總之，沒事就不積極地去管，政治上保持安穩便可以。

問：這是否代表政府沒有重市區輕鄉郊的取向？

答：我覺得是放任。其實市區都不甚重視，整個政策都只是放任。出來的政策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是有問題才去處理的心態。

問：在二次大戰前，政府對香港教育的投資不大，但戰後，修改津貼則例、擴大對小學的津貼，又推行七年計劃，大幅增加小學學位，為何港府有這樣巨大的轉變？

問：主要是因為社會的需求。香港人口在戰後增加了 many，1945 時有 60 萬，到 1949 年已有 190 萬，1955 年就有 250 多萬，由此可以看到當時教育需求的大幅增加。其實，若果沒這麼大的需求，就不會有什麼「多少年」（長遠）計劃，因為當年真是有很多由大陸來的移民，這是很重要的因素，對於為什麼有七年計劃和小學學位的增加，可以看《從榕樹下到電腦前》一書。

問：直至 60、70 年代，村校和政府的交往都透過理民府，這和市區學校大有分別，為何有這個分別？

答：新界是一個特別的地區，都是政治原因，即新界接近大陸。而在理民府在政府架構的分工中是管理新界事務，有些資料是說它是負責協調鄉民關係。可能新界有一些鄉事勢力，政府覺得（由一個部門）一起處理會比較好。所以理民府就管理新界所有大小事項，包括學校中一些很微細的事。其實這也很有趣，但我找的資料並沒有你們所問的「為什麼政府要這樣做」。村校其實

是鄉事的力量，因為村校是屬於那條村的，所以關係並不如市區那樣。但若把村校定為一社會組織，村校是在一個鄉村的 community 裡面，這就是與市區最大的分別。

問：為什麼政府於戰前對教育的承擔這麼小？

答：其實由 1941 至 1971（政府對教育）的規劃都是小的。

問：戰後政府對教育的承擔、津貼額都比戰前多，除了人口的增加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嗎？

答：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問：即是戰前時，政府對教育的承擔很小，是放任的。那為什麼戰後政府願意投放那麼多的資源去教育？

答：其實戰後也不是投放了很多的資源。意思是在 4、50 年代，每年的財政預算都只有 8–10% 用在教育上。可以說政府是用最節儉的方法去辦教育，是一種回應方式。當時辦的都是津貼小學，津貼小學並不是政府提供所有的資金。即使興建校舍，都是一比一；即村民籌一半錢，政府再出另一半錢，這其實是一個很節儉的方法去辦普及教育。例如教會學校就是教會自己出錢，所以現在香港有很多教會辦的學校。當時香港能應付這麼大的需求，並不是因為政府投放很多資源，反而是民間（資源），從謙也是這樣。村民辦學不止是籌一次錢，而是很多次。村民會賣牛，這或會被家人罵：「你為什麼要把牛賣掉？」他們很重視教育，認為小孩子不接受教育就等於沒前途，很中國人的觀念，於是就籌很多次錢，一元、兩元那樣。他們會把家裡的生財工具，例如牛賣掉，再捐給學校去興建校舍。其實政府只是出了少許錢，但民間就投入了很多。這種辦學和普及教育，若以陸鴻基教授所形容的，就是一個轟轟烈烈的過程。根據資料，50 年代時，平均每 17 天就有一所校舍興建好。

問：但為什麼政府需要普及教育呢？辦教育是否為了處理青少年問題？

答：政府真是意識到這（青少年問題）是個很大的社會問題，是在兩次暴動之後。若看文獻，在暴動之後，政府就調查為何會有暴動，看到原來有很多應該在學的學生游手好閒，於是政府就加速推行免費教育，所以在 71 年後就有 6 年免費教育及 9 年免費教育。這兩項政策的推行都是在暴動之後的，就加速了免費普及教育的日程表。之前都可以說有這種因素，但這只是一種回應式，政府不很感覺到社會上有很大的危機，而是覺得真是有這種需求，所以它就以回應式去興建學校。不過，在興建校舍上，政府採取一個很聰明的做法：自己不是投入很多資源，但民間卻投入很多。其實不是政府做，民間自己的推動力是很大的。鄉村自發地去興建學校，不是被人強迫，政府也沒有叫他們興建。另有一個原因，在民國時期，有很多遷移到香港的國民黨官員，他們到香港後，看到很多小朋友沒書讀，於是，他們就投入去推動鄉村教育。其實早期有些村校是一些有國民政府遷離背景的人辦的，他們以前在大陸接受教育，但來到香港後就感覺到有好多小朋友沒書讀，所以就有種憐惜、悲

憫之情，決定辦教育。可能開始時只是一個很粗糙的環境，譬如只有一間屋、一間廟，但當學生慢慢增加時，就開始要擴充學校。此外，南來的讀書人，覺得自己以前是受過教育的、有文化的，但看到很多孤苦無依的小朋友沒書讀，所以就有想幫助他們的心理。他們由這種心理出發，再慢慢發展。同時，當時民間的投入是很大的，是難以想像的。就如長洲公立學校，它的捐款冊是動員所有長洲的人，真是很有魄力才可以做到。其實興建一間學校，政府並不是花很多錢，但民間就投放了很多，政府只是幫助少少而已。

問：我們知道在戰前，香港小學教育沒有統一的課程，何時開始有統一的課程？為甚麼會出現一個統一的課程？

答：這就要視乎統一課程是否指村校。60 年代仍有私塾，而私塾是未必有統一課程的。其實當時有教育條例，所有正規學校註冊都有統一的課程。同時亦有學校不註冊，但它們並非正規學校。其實我也不太清楚你們所說的村校是否包括私塾。只要註冊了，就一定會統一課程。

問：我們可以在哪找到當時小學的課程？

答：中大圖書館有兩本關於此的書，都放在 Hong Kong Collection 中。而我的資料未曾整理完，當中有學籍表，但詳細的就要仔細地綜合所有學校的資料，做一個 summary 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有什麼科。就如農常，我就不知道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即是詳細的課程轉變就要再找資料，因為政府沒有清楚說明何時有什麼科。

問：那這個課程是參照甚麼國家的模式擬定？

答：早期是英國，33 年時的統一課程是參照英國的。而早期時，香港沒印刷教科書，都是由東南亞入口的。

問：其實我們也想知道在這數十年間，小學教師的師資訓練和教師職級有甚麼發展？

答：這題目的範圍太大了。其實我不能隨便地告訴你們，因為我要很清楚仔細地說，範圍太複雜了。初時有甲級教師、乙級教師，之後有文憑教師。而甲級教師和乙級教師亦會因畢業而作不同的處理。現在我不能背一些很仔細的資料給你們，其實這與你們的報告有沒有很明顯的關係吧？因為這實在太複雜了。當中有些老師是讀夜校，有些是讀日校。一個老師的職級如何升、讀什麼資歷才可以升，都是很複雜的過程。

問：在教師的薪酬和待遇方面，政府有否不同的政策？

答：鄉村和市區是一樣的。剛才我也說過，愈偏遠的地區，薪酬就愈高。

問：其實 1950 年的費莎報告（Fisher's Report）曾建議每二十間村校群中設立一間中心小學，這個建議最後有沒有實行？

答：如果以我所面對的學校，其實應該是沒一個中心小學。反而是分散的，一條村、一條村那樣。即在最蓬勃時，都只是一村一校，可能是村和村之間太分散吧。因為設中心小學可能存在交通的問題。50 年代時的交通仍是不太發達。後來才會有中心小學。前幾年時，所有西貢區的村校，變成一間中心小

學。

問：我們知道村校最初成立是以服務一條村為主，為甚麼不能像市區一樣興建大型小學？

答：什麼是大型小學？

問：即是市區中比較有規模的小學，不像村校般只有數間課室。市區的比起鄉村的大些。

答：大小方面，其實村校一點也不小，是很大的。若果是地方面面，如龍山學校，它就有一個大草坪、一個大籃球場，後面更有一個很多樹的大草坪。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村校的校舍絕對不小，可能比市區的還要大。如果以學生人數來看，在最蓬勃時，村校的人數都好多。可能在你們的印象中，村校是很小的，其實並不是的，有些都好大、好美，學生人數在最蓬勃時亦有八百至過千人。若果大型小學是指千禧學校，這就當然沒那麼現代化和大型。千禧學校也只是後期才出現而已。另外，村校主要 cover 的範圍就是村附近的學生。在最蓬勃的 70 年代，人口已經慢慢開始下降，再不需要像市區那般興建大型學校。因為需求已經不同了，都市化和城市化令人口向外移，所以鄉村人口的最高點是與香港最繁榮的時期互相吻合。

問：村校最初建立是服務一條村為主，會否因為村與村之間有語言上、文化上的不同，才不會有一些較大型的學校去讓兩條村的人入讀？

答：因為一間學校所服務的對象是不一樣的，有不同的背景才有那間學校。你可以想像，兩間差別那麼大的學校如何去合併在一起呢？每間學校所服務的對象是不同的，現實上是沒有需要去合併。除非後來的人口減少，大家都收生不足，所以才有需要去合併。其實這兒有少少問題，「一條村為主」，即是學校開始成立時是以村為單位，不過未必指一條村，因為一間學校可能有幾條村的學生，有幾個姓。總之，那些村一定是周邊的村；幾條村派一個代表去辦那個學校。當然亦可能只有一條村。

問：剛才你說過村校的服務對象是以周邊村落的村童為主。規模上，可能是指班房、資源籌集等，可能較市區學校為小，這是否其發展的障礙？

答：其實這兒有些錯覺。如果真是具體地去說一間村校，它相對於後來的市區學生就少了一個大禮堂。但並非每間都沒有，有些是有的。另外，到後來的 QE Fund (優質教育基金)，一些村校是有電腦的。其實，村校在硬件上未必可以和千禧學校比較，因為千禧學校實在太優越，但村校的自然環境是市區學校比不上的。例如校舍會比較寬闊、空間感比較大、有更多的樹木、有比較少的班級，所以師生的關係會更親密。學生在這種環境中讀書時，若果那村校辦得好，他的教育歷程未必比在市區學生差。即是說村校有其獨特的地方，是市區學生不能取代的，兩者是有差異的。

問：何時開始，新界出現有幾層樓高的大型小學？

答：如果是指新界，很早就已經有。有新市鎮時就已經有了，亦與城市化有關的。其實真是不知道大型小學何時出現。如果普通的六層高校舍，在很早就已經

有。因為新界的範圍很廣，亦包括大埔墟。

問：其實屋　學校開始與村校競爭，它們有更多、更好的硬件，有更大型的校舍，更多的班數。這會否為村校帶來影響？

答：一定有。城市化令鄉村人口遷移到市區，在鄉村住的人都上樓了，即申請到公屋或居屋。當他們離開自己村去屋　住的時候，自然會帶走他們的子女。通常一條路或一個屋　興建在鄉村或村校附近時，自然會少了人讀村校。7、80年代時，人口開始下降，城市化愈來愈厲害，所以村校的收生都開始下跌。你們所說的競爭是絕對存在的。現在為何要殺校，就是因為人口少。若果有選擇，人們都未必會選村校，而去選擇標準學校。但其實村校亦有其存在的意義，就如我剛才所說的原因。因為有些小朋友在一些大校中讀書未必開心，而在村校中可能讀得更好。村校的功能其實在轉變中，以前是服務一條村或以村民為主。在人口慢慢下降時，收生愈來愈少，於是開始由不同的來源收生：例如一些在邊境附近的學校，就會收由大陸來的跨境學生；有些會收新移民；在某年代，更會越南難民的子女；亦有些因不能適應大校而入讀村校學生。其實這些學校擔任了一種很重要的教育功能，承擔了一些主流教育，即正規學校，的不足之處。其實村校是做得好好的，但都被殺。

問：剛才提到有城市化的問題，這又與村校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答：城市化的第一個特徵是道路的興建。例如當屯門公路興建好，公路周邊的村校都很快結束。村校在位置上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如果有條道路在校門前經過，那條村的人就很容易出去，學校就會很容易收生不足，除非能轉型去收不同的學生，如從不同的途徑，好像少數族裔，如巴基斯坦學童等。另外，如果有　校時，外觀又美麗又新，人們多會選擇外面的學校。所以，城市化是鄉村學校式微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問：農業的興衰對於村校的日常運作有什麼影響？

答：有。第一是沒有農常的科目，因為沒有農業了。第二是對鄉村的生活有影響。因為當時是農業社會，學生課餘時要幫家人手。後來沒有農業，城市化了，大人就要到外面找尋工作。不過，其實未必是農業的影響，因為農業和社區的經濟發展有關係。例如元朗區是以種米為主，後來就沒有了，這影響了家庭的收入。早期時，家長付學生的學費是很難的，即使是幾元對他們來說也很多了，因為他們很窮。但當慢慢轉型時，農業淡出，家長就會找尋其他工作。農業衰退後，有另一樣東西取代了它。可能城市化興起時，家長本身的收入來源就不同了。他們會搬，因為不能務農，就會帶小朋友出去市區。此外，有很多新界原居民移民到英國或歐洲開餐館，這反而影響了村校的發展，因為在5、60年代，許多青年人去了外國打工，因為他們畢業後沒有什麼出路，很多人選擇出去打工，很多都會一直待在那邊，人口因此而減少。所以，只有老人村中居住，年青的都不在了。這種現象其實十分影響新界的發展，也影響了鄉村的發展。

問：城市化對村校發展又有何影響？

答：又是很大範圍的問題。一定有分別。沒分別的地方是升學的壓力都是大的，因為其實村校都很想學生升到中學。不同的地方可能是，有些村校位於邊境的附近，就會有和大陸很密切的關係，而市區的學校就不能有此。例如村校會派一些校車到深圳接學生上學放學，但他們是不會到市區學校的。

所以，特別是接近邊境的學校就會有這樣的差異。

問：現在村校面對「殺校」的危機，有何因素令到村校衰落？

答：村校的衰落是因為人口下降和城市化。另外是其他學校的競爭，如 校、千禧小學等，主要是這幾個原因。其實多數的教改都希望更新、進步，某程度上，鄉村學校在這方面的動力比市區學校較少，因為它們都會循古老的方法辦學，未必會如市區學校般去革新。但是，有些村校其實走得很前，政府有什麼改革，它也第一時間去響應。但亦有相當的村校比較喜歡用自己的步伐去教，於是，相對來說，村校（在教改）的步伐比較慢。

問：村校除了補其他小學的不足之外，村校在香港教育史中肩負著什麼角色？

答：當香港未城市化時，所有學校都是村校，所以許多讀書人都在新界的村校畢業，因為當時仍是農業社會，仍是一種村落的形式。如果這樣看，其實在那個年代，當時香港的教育史就等於村校的教育史，特別是新界的歷史。其後，隨著城市化，村校的角色也慢慢轉變。其實這段歷史仍未完的，因為有村校仍然存在，我們不知道它們怎樣去轉型。我自己覺得村校在香港教育史的角色很重要。特別是在早期，即是開始普及教育的時候，若不是有村校在民間這樣投入，就不能成功地推行六年及九年免費教育。

問：我想問，村校的發展可以分成幾個階段？

答：如果以我剛剛所說的，最早就是私塾，私塾可能位於祠堂或在民房中；其後就會申請建立一所獨立的校舍，我們稱之為津貼小學；在最高峰時會擴建或搬遷校舍；其後就慢慢開始衰落，就如一條 curve，慢慢上，然後慢慢落。

問：你訪問過很多村校，在日治時期，多少學校依然運作？

答：我不能清楚地說出數字，但我可以介紹你們一本書，《從十一萬到三千》，張慧珍的口述史。三千是指抗日戰爭時仍在讀書的人數。

問：當時的教學有什麼改變？

答：當時是要讀日文的，有很多書都用日文。

問：當時所有學校也是這樣嗎？

答：是。但當時有很多學校多結束了或停課了。

呂潤生校長訪問紀錄

日期：二〇〇六年五月九日

時間：下午二時

地點：從謙學校圖書館

呂潤生先生為現任從謙學校校長，自 1969 年於羅富國教育學院畢業後，便開始在從謙學校任教。呂校長自小在九龍坑長大，當時也在九龍坑和大埔頭的村校接受小學教育，對戰後鄉村教育發展知之甚詳。

問：凌、張、彭、徐四姓先賢對崇謙堂村和從謙學校貢獻良多，他們之間有何關係？

答：據我所知，彭姓和徐姓存在著姻親關係，而凌、張、彭三姓先賢則是傳教的，與教會有直接關係。徐仁壽先生從內地來港並落地生根，與彭姓先賢建立了姻親關係，還有姓陳的，但沒有參與崇謙事務。由於姻親關係便引領他來到這裏，繼而發展下去。

問：他們的後人有沒有在從謙學校就學？

答：他們必定有在這裏讀書，例如徐仁壽先生的子女徐家祥、徐聲祥和徐謙祥都是在這裏畢業的，而姓彭的也是，像彭樂三的子孫彭朝安、彭朝仁都是從這裏畢業的，甚至曾在這裏任教，彭朝仁便在此擔任校長一職。還有姓張的，但不是直系親屬，而是姻親或同鄉關係。

問：當時崇謙堂村人多數都是信教的嗎？

答：崇謙堂村本身都是信教的，雖然不是第一條擁有教會背景的村落，但總算是教會比較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有幾個傳教士在此辦了一個團體，較有凝聚力，所以教徒較多，久而久之，便集居在這裏了。事實上崇謙堂並不是有太多人，開初只有約十戶。不過現在則沒有規定必須信教，由個人決定，當然這裏仍會有教堂，每星期也有些聚會的，無異於一般教堂。

問：五十年代從謙學校註冊為法人團體，有會員一百人，他們是甚麼人？

答：我並不太清楚何謂法人團體，假如是談到會員的話，應是指聯安農業協會了，那是正式成立的組織，在四、五十年代時，多數只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只是一個普通的組織，也不會去登記或者正式註冊成為協會，但聯安農業協會卻是正式成立的，發展至大約六十年代，我們學校甚至註冊成一間有限公司。會員多為附近的農民，包括龍躍頭等附近村落的農民，在特定的時候便聚首一堂，儼如現在的社區聚會般，一方面讓大家多些認識對方，也順道推廣一下公共事務。

問：他們的子弟多數在崇謙堂就讀的嗎？

答：對，除非他們都搬了出去市區住便不在此讀書。其實在六、七十年代，學校的數量不多，尤其是新界，以粉嶺為例，龍山小學是直至一九六幾年才

開辦，所以附近的小朋友多在從謙學校就讀。

問：可否這樣說，這個會社是崇謙堂和附近農民的組織呢？

答：正好相反，該是這幾位先賢認為有此需要便建立組織，並透過教會勢力，

不論是以教育形式也好，宗教形式也好，來凝聚、召集村民來參與，然後進一步擴大。這樣的解釋便較為合理。

問：每年的會員大會是否就是指聯安農業協會的會員嗎？

答：對，他們以前還需交會費的呢！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會費是五元，在當時五十年代來說五元是頗大的數目了，直至四年前才取消收會費，免得麻煩。一直以來會費都是五元，但我相信四、五年前的五元和四、五十年前的五元差額很大，其實收會費也只是象徵式而已，後來便不收會費，至於人數是否一百人，我也不清楚。在我任教開始，最多還有三十多人來開會，近年來曾經少至只有數人開會，當然那十幾名校董除外，實際上非校董而來開會的會員真的不多。以前開會可能真的被視為正式的大會，雖然我沒有看過紀錄，但那時開會就不單單是討論大會的事，還會談及有關農田灌溉的話題，後來組織多了，起碼有鄉事委員會和政府的理民府等，這些組織可以協助他們處理，再者由於會員大會在學校開會，故後來討論學校事務的話題便多了。

問：呂校長曾提及 Class Grant，所謂 Class Grant ？

答：正確來說應是 Class and School Grant, Class Grant 指的是班級津貼，School Grant 是學校津貼，不論是津貼的中學或者小學，都有一筆定額的學校津貼，另外的班級津貼是給每一班的，若非津貼學校便不會有這些款項，當初這幾位先賢辦學真的是一分一毫都由自己去籌募，後來由於徐家祥先生在理民府任職，教育署也是透過理民府處理這些事務的，故此可能較為方便。當時每月取得約六十元補貼，後來由教育署正式訂立從謙學校為津貼學校，便定期發放津貼給學校輔助其運作。但當時這批津貼並不足夠，不像現在般包括各樣開支。

問：南來知識份子（老師）對從謙學校有何關係和貢獻？

答：當時中國政權移交時有大批人來港，有文人在此地落藉要找工作的便選擇在從謙學校教書，例如羅香林的妻子（朱倓女士）在此任教十多年，另外亦有幾位老師，姓張姓徐的，雖然未必是創校先賢的直系親屬，但至少也是同鄉，有點關係的，因此便在這裏任教。當時由於他們的家鄉在五華附近，以客家人為主。從謙學校曾經以客家話作為教學語言，在九龍坑對面的崇真堂便是一直延用客家話教學，直至停辦前幾年才取消。我們從謙學校也曾用客家話教學，但至於用了多久我便不清楚了。崇謙堂教堂早兩年還是用客家話傳道的，因為那牧師是客家人，後來才用粵語講道。而這些來自內地的老師便會把他們的教法和文學帶來從謙學校，始終他們並非出身自香港教育學院，部份老師可能只懂客家話或普通話，而學生都是講客家話的，因此問題並不大。

問：我們在不少資料中都看見羅香林教授，甚至曾為校刊寫序，他和從謙學校是如何結下淵源的呢？

答：我所知道的並不多。羅香林教授是崇真會教堂教友之一，他太太也是，初期他們也是在這裏居住，於是他的太太便在這裏任教，至於有沒有其他特別關係，我便不清楚了。

問：那麼凌道揚先生呢？

答：他是凌啟連先生的孫子，凌善元牧師的兒子，但這是準確我也要再查證一下才清楚，但他一定是凌氏的後人，現在仍有很多凌氏子弟在崇謙堂村。

問：但凌道揚是否曾在此任教或就讀呢？

答：他應該是在這裏就讀的。

問：呂校長曾在五、六十年代在新界就學，當時的學習情況是怎樣？

答：我本身在九龍坑讀書，當時香港的模式是由於交通不便所以政府不希望學生長途跋涉，於是便在各區興建一所很小的學校，可能只有兩個課室的，甚至老師還要在那裏住宿，所以這些學校便是用複式教學，上次我也有向你們提及過。甚至在我就讀時有三級教學，就是一班包含三個年級的同學一起上課。在一年級至四年級我便是在九龍坑接受複式教育的，所以對於鄉村小學和小朋友的活動和想法我是很熟悉的。在當時來說鄉村小學和市區學校分別不大，設備方面比較簡陋，但從謙學校在當時來說是比較先進的，起碼不是金字頂只有兩個課室之類，是畫圖則而興建的。學習情況方式，我相信市區的學生成績較好，新界學生成績較差，這現像和學校的關係不大，反而分別是於家長，市區的父母較為注重子女成績，而新界父母則是自由放任子女，不太理會，我小時候便是這樣，家長也不會管我的學業。礙於家長知識水平低，可能是文盲也不足為奇，同時也為工作糊口，對於教育子女真的無能為力。另外市區的孩子被困在屋內不能外出，但鄉村小孩則不會受管束，放學後不會留在家，一來家中沒有電視收音機等，一定是會去隔壁鄰居家玩耍，或者到河邊樹蔭玩樂，稍為勤力的小朋友便會回家做功課，懶惰的便會玩完回家也不做功課。這是普遍的情況。我的家沒有太多田地要耕，有些要耕作的同學便要幫手淋水、施肥等。

問：你讀書的時候有農業常識科的嗎？

答：有，不過是叫農村常識科。

問：那是學些什麼的呢？

答：有關農學的知識，例如如何做皮蛋、咸蛋，如何種白菜，如何處理去水等，年年不同的，我在一九六零參加小學會考也有這科目的。不過可能市區便不會選擇這科，或許會讀公民教育吧。

問：是否從一年級便設有這科目呢？

答：我記得我轉往啟智學校讀書時從四年級才開始讀這一科的。

問：這科農村常識一直維持至何時呢？

答：到我教書時便已經取消這一科目了，但我沒有追查。

問：普遍來說，當時從事農業耕作對學習有所影響？

答：說有也可，說沒有也可，在我家裏我較為幸運不用耕作，因我父親有另外的一份工作，家人也不會管我的學業成績。許多鄉村孩子也不用幫手耕作，可能因為家中無田，每天便去玩樂，玩累了便回家睡覺，其實這在乎小朋友的自覺性。但當然亦有一部份是不同的，在我任教時有不少家庭生下很多小朋友，那些學生回到家真的要做很多家務，但是家長會否堅持要孩子做家務不許做功課，我未接觸過這類家長，但我相信不會。但是即使現在，小朋友也可以說昨晚父母要我做其他事以致欠交功課，只是一聽便知是藉口。

問：會否學校的作息時間，假期等與農忙掛鉤呢？會否農忙時多些假期？

答：這就絕對不會了，因為學生所佔的勞動力很小，而且規模不大，不過這情況在漁民子弟便較為明顯，他們出外打魚可能會去整個星期的，便會影響課業。但對我們來說，耕田也只是在附近的，假如真的很忙便請假一天回家幫手，尤其是高年級同學可能有這個需要，但未至於要把假期調動。

問：在你求學時，區內的交通情況又怎樣？

答：我在一九六零年時到九龍塘上學，要由九龍坑乘搭巴士 15 號車到大埔墟火車站（火車博物館的現址）轉火車到九龍塘上課，火車班次不多。那時乘搭巴士費用約一角，但很多時未必有車，滿座無車可搭，尤其是在星期一和假期後巴士便會滿座不會停，因為許多在市區工作的人會趁假期回家。那時還有一種交通工具稱為「白牌車」，這些貨車本來用作載貨的，但車頭有幾個空位，假如順道的話便會載你一程，當然你需要付車費。由於交通不便，所以當時的市區人認為新界是很偏僻的地方，我在教育學院的同學一聽見我在粉嶺任教便認為好像被充軍邊疆的感覺。

當時一九六七年也有巴士從九龍坑直到九龍塘，但約需一元一角，而乘巴士到大埔墟再轉乘火車則需要約八角，可能你認為只是小數目，但每天來回便會是大數目。當時我乘火車是買一學期的車票，當然九廣鐵路是屬於政府的，因此政府會資助。那時分兩種車票，一種為三十六元一學期，但卻有規定乘車的班次，不能誤時，否則便要重新購票，另一種為四十八元一學期，沒有時限也不計次數。但我試過因趕不及往大埔墟的巴士，故須直接乘巴士往九龍塘。學生有半價優惠，但要寫明自己的目的地，手續繁複，一般人不會乘搭巴士，因為價錢昂貴。

問：那麼粉嶺區內的交通情況又怎樣？

答：一樣也有巴士的，現今的小孩十多分鐘的路程也要乘搭校車上學，但以前步行往布格仔也要半小時，不論由九龍坑到聯和墟看戲或是跟著媽媽到大埔墟買菜也是步行的，一方面為了省錢，另一方面也是習慣。假如要乘車的話，巴士只有一條線，由佐敦道直 上水，另一種是的士白牌車，還有剛才所說的貨車，當時亦不會有的士。所以當時新界的交通工具選擇真的很少，多數步行。

問：村民出國、工業化、城市化對從謙學校有何影響？

答：出國即是移民，由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量港人前往英國工作，由於當時英國需要大量餐館勞工，後來便舉家移民，但這對學校的影響不太大。

工業化方面，則沒有什麼影響，學生同樣要上學，反而對生活模式有影響，在衣著、生活方面有改善，由六十年代生活質素開始直線上升。

問：八十年代屋
學校出現，對從謙學校的影響反而是多了學生嗎？

答：當初興建屋
，政府會計劃好一切，預計好出生人數等，並有不少配套設施，興建學校由辦學團體認辦，但不知道是否政府估計錯誤，總而言之，屋
學校學位不足以應付龐大的學生數量，所以從謙學校便收了許多屋學生，高峰期約有三分一至一半是屋
學生，令鄉村學校學生人數增加。但後來逐漸地人口減少，便有學位空缺的情況。另一方面，鄉村的父母得知屋
學校規模大，便會送往屋
學校就讀，這是較近期的事，大約是近十年的情況。

問：呂校長你說學校由辦學團體認辦，那些辦學團體是由市區來的還是本地的居多呢？

答：理論上來說是沒有規定的，任何團體也可向教統局申請，但正常來也不會以人名義申請，因為辦津貼學校是無利可圖的，故多以慈善團體和有辦學經驗團體為主，例如保良局、聖公會、東華三院等，他們寫計劃書經驗較多。其實私人機構也可以申請的，崇謙也可以，不過校董局沒有這意思，故也沒有申請。

問：以粉嶺區來說是否以大的辦學團體申辦新型小學居多呢？

答：村校是地區性的，故以本地團體認辦為多。

問：那麼屋
學校呢？

答：這是多以大型辦學團體認辦的，始終新界的私人團體辦學經驗較少，不及市區的經驗豐富。

問：謝謝呂校長接受我們的訪問。

溫煌有先生訪問紀錄

日期：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溫煌有先生寓所

溫煌有先生現年七十六歲，一九三九年入讀從謙學校，是從謙學校三十年代的學生。一九四一年日本佔領香港，令學校停學，他亦暫停學業；戰後復元後入讀三年級，但稍後又輟學歸田。當新界稻米耕種式微後，曾當了三年華籍英兵，後來往英國工作。溫先生對二次大戰前後從謙學校的情況有深刻記憶及切身體會。

問：溫先生，請問你在何時開始讀書？

答：我是在十一歲開始讀小學一年級。當時許多家庭都十分貧窮，不是自小便開始讀書。我在一九三九年左右入學，但讀了兩年小學，日本人就佔領香港。我記得當天是農曆十月十日，早上八點有人（林才伯）從沙頭角傳來日本人侵佔的消息，眾人驚慌，不久英軍便將羅湖那條鐵橋炸毀，以防日軍過河，炸了孔嶺和一號橋。當時並沒有太多公共交通工具，只有中華巴士公司的巴士由沙頭角駛往粉嶺，大小類似今天的公共小巴，但由於巴士不足，戰後還將貨車改裝巴士。

問：溫先生，那你當時住在那裏？

答：我當時住在祠堂村，以前我們是一個家族聚居在那裏。後來分家，大家才各自生活。

問：為甚麼在十一歲讀書，不在七歲時入學？

答：因為以前生活窮困，年紀小還不知讀書的重要性，而且並非每個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的。

問：那入學前，溫先生是在做甚麼的？幫忙做家務還是玩耍？

答：那時是幫忙做家務，什麼都要做，例如煮飯和洗衫。

問：溫先生是十一歲便從祠堂村來從謙學校讀書，對嗎？

答：對，從謙學校是彭國禮先生的祖父彭樂三先生擔任校長，他來到崇謙堂傳教，後來更興辦了從謙學校，至於他是如何興建這所學校，我便不得而知了。這學校是讓附近五圍六村的人有機會讀書，那時有不少窮學生無力繳交學費便要拖欠學費，可分期歸還的。

問：那時是你自己要求讀書，還是家人叫你讀書的？

答：我那時還不懂得要去讀書，是我父親要我讀書。他認為我十歲時還未定性，整天想著玩，十一歲才是適齡入學，而且家中無人識字，無力教兒子，只好要我出外上學接受教育，便到從謙學校讀書。

問：你是一九四零年入學的嗎？

答：我在日本入侵香港前兩年入學，應是一九三九年吧！

問：溫先生你那時為何會選擇入讀從謙學校呢？

答：因為在祠堂村沒有學校，而且附近沒有學校，彭樂三先生才辦了從謙學校，連上水、沙頭角也有人來讀書，我太太的弟弟也是在從謙學校讀書的。

問：那時的讀書情況是怎樣的？

答：那時我是二月開學，由朝早讀到十二時，然後回家吃午飯，飯後一時再上課至下午四時。我們以前讀書不同現在，現在的人讀書比較辛苦。我讀書時已不用自行搬桌椅上課。我記得那時我是正月初八便交學費報名給一個會，這個會每年也有會員大會，每家人也有西餅拿回家的，這個會名為聯安。那時客家人被本地人欺負，我聽說連安樂村的那條橋也不準許客家人走過，後來辦了學校後，彭國三先生和他們打官司才允許客家人過橋。

安樂村是由一個很富有的家族擁有的地方，屬於私人地方，我聽說這家主人名為李瑞石，我母親也曾在那裏打工，那裏真的很「安樂」，假如沒有日本人入侵，他們也不會離開那裏呢！那時日本人還選了那裏居住，那裏是一個古老的莊園，有一個大鐵欄，門口有個牌坊寫著是安樂門，十分宏偉美麗。以前還有幾戶人家很富有的，除了姓李，還有姓鄧的。以前他擁有三棟屋，有一位西醫名為李伯華，和彭樂三很熟絡。

問：那時是誰當任校長的？

答：我也不太記得，廖其銘也不是擔任校長，徐贊賢的下一任是徐聲祥，有可能是彭朝仁擔任，而彭國禮的母親也是教書的。

問：那時有多少個班房？

答：那時共有六個班級，一年級和二年級共用一個班房，就如複式教育般，六個班級三個班房，一個老師教兩班，全校總共三個老師。我讀書時的老師姓黃，姓龔，還有彭朝仁先生的太太，姓韓的。

在戰後，彭朝仁先生才從台灣軍校畢業回來，所以應不是他當校長的。

那時上學，每天一開便是講道的，好像早會崇拜般，第二次響鐘後才開始第一課節，在課程中亦包括了宗教科，在高年級要考試的，有些學生考得不好是要被罰的。

問：你本身是信教的嗎？

答：我小時候是信教的，因為那時我的祖父母都信所以成家都信教，後來分家後便沒有信教了，讀書也沒有信教，直到我結婚還未信耶穌呢！

問：那時你是幾點要上課的？由祠堂村步行至從謙學校要多久呢？

答：路途不遠，很快的，大約只需十分鐘腳程，但年青人應該會走得快點吧！

那時大約八時三十分上課，那時第一節課是上漢文課，內容不是「人之初」，那些是較前期的課程內容，大約是我哥哥在穀詒書室讀書的時期。我讀書時讀的內容是「日，日出」等。

問：還有其他科目嗎？

答：還有公民（公文？），內容我忘記了，那時要整天抄書，老師教完便要抄書，用客家話教書，老師都是五華的客家人，另外有音樂、美術、歷史、

數學，但沒有英文，直至戰後三年級才有英文課。戰前四年級也沒有英文課，但這間學校由於彭樂三先生較有學養和較富有，因為他是信基督教，和洋人的關係較好，於是有机會接受西方教育，身份地位較高。彭朝仁先生會去台灣讀軍校也是因為想當官，那時是國民黨。

那時徐仁壽先生很富有，創立了華仁書院，後來因為與神父不和才離開，但子女有終身入讀權。

問：除了以前幾科，還有別的嗎？

答：高年級的還有書信，三年級有珠算、論說（論語），四年級讀孟子。

問：上午要上幾多節課呢？

答：大約三堂，因為復式教學，所以時間長了，可能三堂等於現在的六堂課了。

問：那麼上完三堂課會做些什麼呢？

答：一是回家吃飯，但亦可以留在學校食，這裏有餅乾賣，沒有別的東西吃。

問：幾點再回來上課？

答：一點上堂，四點放學，都大約是三堂，一星期還有一次體育課，一星期上堂五日半。

問：一班大約有多少學生呢？

答：一年級有較多同學，五、六年級較少學生，好少人讀到畢業。我讀的時候人數不多，一年級約有二十多人，二年級約有十六、七人，有時一張書桌兩人坐，有時一張書桌一人坐，三、四年級在別的課室，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問：你讀小學一年級時的同學多數是多大？

答：最小約八歲，我想多數人都是八至十歲。讀了一年多日本便入侵香港。

問：溫先生，日本人炸橋後你們怎樣了？

答：炸橋後無書可讀，但是張和彬的女兒張瑞雲（亦稱雲姐）是虔誠的教徒，在家中私人教學，那時約有十人去她那裏讀書。學校則有用作憲兵部，用作監房，聽說每天中午十二點便鎖著犯人去學校前的那條河洗身，用鞭打他們。那些犯人多為走私、搶劫的犯人。日本人進佔香港後叫大家不要驚慌，派米派糖，一個月只有一斤油的配給。

問：那三年零八個月你在做什麼的呢？

答：我沒有書可以讀，便去了耕田種禾，很辛苦。

問：在你讀書的時候已十一、二歲，農忙時要去幫忙嗎？

答：我要去幫忙，不過因為不懂耕田，只是幫忙煮飯，但即使農忙也會如常上學，因為那時男孩子不用做太多的家務。日軍侵佔期間，我跟隨雲姐讀了數個月便沒有繼續讀下去，有些人則會繼續下去。而在和平後我則讀了一年的三年級便輟學，因為生活實在太窮困了。

問：那時一年大約有多少次考試呢？

答：一年大約兩次，一次小考一次大考，要考試考得好才可以升班的。

問：那時有教科書的嗎？

答：沒有。

我讀書時有巡學員，他們大約一年來一次、半次，巡視一下學校的運作情況，那時同學每當聽見巡學員到來都有點驚慌。

問：溫先生，還記得當時繳交多少學費嗎？

答：我不太記得了，小朋友多數不會過問這些的。

後來政府發放助學金給窮學生接受教育，但不是我讀書那時期，是較後期的事了。

問：你讀書時要購買書簿的嗎？如要，買些甚麼？

答：要呀，例如買練習簿和毛筆，我們是寫毛筆字的。數學書不用買，到三年級才需要，因為一、二年級時只是學加減數，較簡單，我那時大約要買三至四本書吧！

問：那時老師又是如何教學的呢？是否同一個老師任教所有的科目呢？

答：一年級和二年級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師，也是由她教宗教科，課程較深的科目便由男老師任教，而歷史科和數學科便是由主任任教，不同科目便由不同老師任教。

問：在複式教學時，當一年級學生在聽課，那二年級同學在做甚麼呢？

答：這個我便不太記得了。

我的太太也有在馬尾下讀過半年書，後日軍便佔香港而停學了。

以前的多數是鄉村學校，沒有甚麼正式學校的，禾坑也有間書塾，姓彭的也有一間，姓鄧的龍躍頭便沒有學校，戰後便在祠堂讀書，後來改稱為龍山學校。戰前我讀書時沒有姓鄧的同學，因為我們是說客家話的，他們是說圍頭話，語言不通。

在學校成立的年期方面，從謙學校是最早建立的，然後是禾坑的覺民學校，擔水坑有一所群雅學校，沙頭角便有東和學校。

問：假如你當時不到從謙學校讀書，可否選擇到覺民學校上課呢？

答：應該不會，因為距離國民學校路程很遠的，從謙學校是距離最近的了。

問：溫先生，這幾十年的交通情況轉變是如何的呢？

答：那時沒有甚麼車輛的，多數以步行為主，在往沙頭角的公路多數是私人貨車，戰前有紅色的巴士。那時多數人會選擇步行至上水、沙頭角一帶，很少乘車。所以選擇學校也是以腳程為主要考慮因素，並非選擇學校本身質素為主。鶴藪、流水響的人也會來這裏讀書。

問：那從鶴藪來從謙學校需時多久？

答：約大半小時吧！

上水許多外人也在從謙學校讀書，但不是姓廖的，他們有自己的學校，而鳳溪學校是後來才興建的。

問：你讀書時有見過彭樂三先生嗎？

答：雖然他沒有教書，我見過他，他不是很老，去世時只有六十多歲，他興辦

了聯和墟，他去世時，大埔崇德學校的學生和上水鳳溪的學生都去送殯。
他那時是太平紳士。

問：他和鄉議局很有關係的嗎？

答：不是。新界鄉議局是他興辦的，後來讓另一位姓彭的人接手。他和香港政府有點關係，好像革命家般，因為他和徐仁壽是姻親關係，所以教堂的人和政府關係不錯，例如張瑞榮也是在理民府中工作的。姓凌的人都是留學生，飽讀詩書，因為他們和教會的關係密切，且有高學養，故張家、彭家、凌家和徐家互通婚，他們形成一條村，便是崇謙堂村了。那裏還有姓陳的和姓林的，而姓彭的人口最少，因為彭樂三是最遲來的，最早來的是凌啟連兩兄弟，然後是姓張的。姓凌的已在崇謙堂村住了好幾代。別的村都沒有電力供應，只有他們那條村才有電力，自學校成立後便有電力供應了，約二十年代，當時未有電話的興起。以前龍躍頭姓鄧的和粉嶺姓彭的都稱彭樂三先生為「客家佬皇帝」，他以打官司出名，他不怕惡人，他曾連任三屆新界鄉議局主席，他資訊足夠又通人事，每次打官司都贏，所以不論土豪惡霸也鬥不過他，和政府互通消息，十分熟絡。徐家祥先生是華民政務司，職位很高，初初是在元朗擔任理民官，後來升級為首位華人政務官。彭樂三先生的兒子是在英軍擔任傳譯員的。和平後崇謙堂的人說他騎著馬回來，崇謙堂裏許多人都是高官。凌道揚以前是共產黨農業部署長，他曾說自己在這裏出生和接受教育，我想他可能在穀詒書室完成小學，後來便往美國求學。

問：凌道揚先生大約在何時出生呢？

答：這應該可以查得到的，或者可以問彭國禮先生，他和凌家後人仍有聯絡的。

問：彭朝安先生有多大？凌道揚是否比溫先生年紀還長呢？

答：彭朝安八十多歲了，凌道揚比我老，他是屬於長輩的，若還在世應有九十歲吧！

問：你後來除了耕田種禾外，還要做甚麼呢？

答：十九歲當過兵，是華藉英兵，名為水雷炮，當了三年兵。當初無讀書，有甚麼工作都會做，那時沒有種菜賣的，只有耕田種禾。當時新界人口不多，沒有人買菜的，因為菜可以自己種，但禾要大批地種，故不是每家都種禾。後來不種禾是因為美國大米大量輸入香港，又香又便宜，於是本地米便不值錢滯銷，故人人都丟棄農田移民往外國，那時大約是戰後的事。戰後內地難民來港，他們沒有地可種菜，於是新界人便種菜賣給這些難民或者租田地給他們。

問：溫先生的哥哥去了外國，那溫先生呢？

答：我在一九五幾年也去了外國，整條村只剩下老人、婦女和小童，所有男人都去了外國，因為英國華僑開餐館在當地請不到人，所以便需要大量人手，那時我們是乘高棉號去英國的，只需寫封信郵寄過去便可以去英國打

工，十分容易。

問：那是何時回港的？

答：我退休後便回來，其實多數人都不會回來的。我的子女現在都在外國讀書成長工作。

客家原居民中，許多男人都無書可讀而去了外國工作，剩下一批小朋友在新界，到了七十年代英國收緊移民法例，以前只有男人到英國打工，但英國經濟在七十年代出現問題，收緊移民法，這些男人已來英廿多年，步入中年，便想他們能一家團聚，於是七十年代便是婦女帶著子女過去英國，更在那裏讀書成長，這些子女多數在港讀小學，然後在外國繼續學業，於是許多人都大學畢業回來。假如他們仍留在香港，家境貧困，最多只能在工廠工作而已。

六十年代新界人生活環境很差，在英國打工的男人日以繼夜地工作，把賺來的錢都寄回家中，捱得很辛苦，約每星期賺五磅錢，到大約六二、三年才好一些，因為待遇較佳。

彭國禮先生訪問紀錄

日期：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崇謙堂村乾德門

彭國禮先生為從謙學校創辦人彭樂三先生之孫。五、六十年代曾在從謙學校就讀，其後到了台灣升學。近年才返回香港，居住在彭氏在崇謙堂村的祖屋。

問：我們有些關於崇謙堂村的事想請教彭先生。

答：我先說崇謙堂村。我這本《香港新界龍躍頭崇謙堂村誌》是先祖父所寫的，當時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在寫這本書成書前的三十七年，有人到龍躍頭區傳教。後來就有更多人來此附近，如 芳，祠堂村，很多人都以農業為生。有些家庭就叫自己在大陸的叔伯兄弟，親人直接移居到崇謙堂。初時，他們都租姓鄧等富農的地來耕種，積蓄夠就去買田，建屋。那時的屋是由泥所興建的，不像現在的磚屋。當時已經是光緒二十四年了，有一百零八年歷史。在你們來的時候，有過門棲寫著一九一零年，就有九六年的歷史了，不過實則就有一百年，因為有三年的籌備時間。另外，遷居來的人都數由李朗、布吉、龍華等地來的，因為那些地方的人都數是客家人。

問：那麼五華呢？

答：也有，但剛剛提到的地方比較近，在這三個地方之前就有五華，梅縣，河源等地方的人一批一批的來到，當中經過了許多朝代，甚至光緒以前。其實客家人所帶的「涼帽」顯示了客家人是宮廷妃嬪的後人，所以客家人自己應該很驕傲。他們南遷就是因為改朝換代、政權的動亂等。他們除了在剛才提到的地方遷往香港外，有些會在四川、湖南等更遠地方到來。而且兩兄弟不會移居到同一個地方，例如：我爺爺到了香港，而他的弟弟就到了南洋。我爺爺就在光緒三十一年到了龍山傳福音。經過十載的努力終於得到教會的幫助。之後做了若干年就辭職，做了其它工了。他與凌啟蓮很要好，因為大家都是傳福音，所以大家就如兄弟般。你們入門時看到的對聯的意思就是指我們幸運地能夠與有道德的人為友。而讀書時的情況，如文人雅士的心境就在牆上的對聯反映了出來。他們兩人合資興建了乾德門，次年才完成。其後有個牧師的後人，大埔理民府一級祕書張瑞榮，住在後面。後來凌道揚覺得愈來愈多村民的孩子需要讀書，所以就去籌集資金，在你們進村時看到的教堂旁興建了一間瓦屋當學校，用複式教學。在日本人投降後，學校未復原前，我母親曾在此（乾德門）任教。由於當時缺乏資源，所以學生都要在家搬桌子、椅子到學校。

問：你的母親是否韓女士，戰前已經在從謙學校任教那位？

答：是。家父年青教書時，因為年少氣盛，脾氣比較暴躁，耐性沒有那麼高。

以前是用古舊的方式教導學生，即體罰。另外，興建學校的情況是經過兩

次的變動。首先是剛才說的瓦屋，再在小山丘上興建校舍，為本村的兒童提供教育，甚至是其他村的小孩子。一九二七年時初步模式，已經向政府申請撥款，政府就只限那塊地作教育用途，然後就批了。我們都很感激政府對教育的貢獻。我的舅公，徐仁壽先生，當時是華仁書院校長，就搬到這兒來，就擔當教育的工作。後來校舍是經過三、四次的改建，由一間小瓦屋至三層高的校舍。在香港淪陷時，從謙學校曾是憲兵總部，日本人把犯人監禁在課室中，釘了很多木板。我很小的時候，見他們在農地上升旗，集隊。其實先祖父和周錫年、何東、卓文都有交流。因為我爺爺在生意上太忙，所以把傳教的事交給他人做。

問：這兒有副對聯，寫著「穀詒堂」，那麼穀詒書室名字的由來會否與此有關係？

答：書室是指當時讀書的地方，穀詒堂時我們的祖堂名稱，有穀就有開心，所以叫穀詒。

問：會否因為穀詒書室是由彭樂三先生創辦的，所以用自己祖堂的名字去命名？

答：這並不是出奇的事。先祖父是鄉議局的創辦人之一，在他六十大壽時，鄉議局全體鄉紳送了他一塊牌。我記得鄉議局初時叫維安局。一九二三年後就有補地價的情況，到一九二五年才叫鄉議局。

問：聯和墟是何時出現的？

答：我印象中，聯和墟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們粉嶺的居民需要一個市場去交易農作物，當時最近的市場只有大埔，經過商議後，就決定興建聯和墟。當中有部分是徐仁壽先生的土地。興建的泥土是由和合石和山上搬來的。到了今天，我覺得聯和墟的發展不大，沒有甚麼工廠。如果要查歷史，就要去聯和商會和聯和置業。

問：彭先生，彭樂三先生是從謙的創辦人，可否為我們介紹一些彭樂三先生的個人歷史？

答：其實剛才都有涉及到他如何來香港，他（的祖先）由長樂來的，在明末清初時開始南遷到廣東龍華。先祖父有八個子女。他為公眾服務而四處奔走，把鄉紳父老凝聚在一起，組成鄉議局。

問：我們在徐家祥先生的回憶錄中看到彭樂三先生曾建立了兩個堂，一個是聯和堂，一個是聯安堂，我們在學校的文件中發現每年都會有會員大會，那時什麼一回事呢？

答：聯安堂即聯安農村協會。組成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為了防止偷水，因為當時農業需要水來灌溉；第二是因為當時治安差。除了組織聯安堂外，亦有自衛隊，互相巡邏，若發現有人在晚上仍在工作，自衛隊便會查問他。

問：即聯安堂的功能是保安及管理農業的問題。那聯安堂的會員與崇謙學校有何關係？

答：會員的子女會在崇謙學校讀書。

- 問：那麼，崇謙學校有個會，會員有百多人，那有與聯安堂有何關係？
答：這百多個成員是本村的代表。
- 問：那麼，該會的名稱是什麼呢？呂校長曾提及過到了現在還要每年開一次會員大會。
答：要翻查紀錄才知道。
- 問：聯安堂是由各村組成的，那麼有多少條村？
答：應該有六至七條村，有祠堂村，崇謙堂村，安樂村，荔等。每一戶的戶長就是聯安堂的會員。
- 問：那學校有個會，那是什麼呢？
答：那是學生會、舊生會。
- 問：從崇謙學校在法院註冊，有董事會，又有會員一百人，他們每年有個會員大會，那批會員與聯安堂有沒有關係？
答：差不多同是那此人去辦的，那有甚麼淵源，就要去查一查才知道。不過聯和堂會員的子女會到從謙學校讀書。
- 問：那麼聯和堂的子侄呢？
答：他們都是去從謙學校讀書，因為當時只得很少學校。所以從謙的歷史在這裡都是十分深遠的。
- 問：有人說彭樂三先生和金文泰總督「好老友」，這對推動從謙學校有何幫助？
答：政府的資助能補市民所不足，我們亦需要政府批文去辦學校，興建校舍。所以，都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去支持。
- 問：你在那年入讀從謙學校？
答：應該在四十多年前，即五、六十年代。
- 問：當時有什麼科目要修讀？
答：和現在相比，科目雖是不同，但都是換湯不換藥。當時，有社會科、公民、道理、尺牘、作短文、勞作、美術等。我覺得雖然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卻沒有分別的。
- 問：那有沒有農村常識一科？
答：有，是關於種菜，亦有少少勞動服務。
- 問：當時的校長是誰？
答：徐贊賢先生。
- 問：當時是全日制還是半日制？
答：全日制的。
- 問：什麼時候上課？
答：八時許。
- 問：上課上到何時呢？
答：下午四時至五時。
- 問：中間的時間是食飯？
答：是，有些人帶飯盒，有些人回家吃。

問：你在從謙學校畢業後，在香港升學，還是到外國升學？

答：後期到了台灣升學。

問：彭先生，你現在是從謙的校監，這數十年來從謙學校有何改變呢？

答：最大的改變當然是校舍方面，因為經過多次的擴建；第二改變就是由框架式的教育改變為自然發展的教育，教育方式變得更新。

問：溫老師先前提及過凌道陽先生，我想請問凌先生與從謙學校有沒有關係？

答：沒有關係的。他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院長。

問：凌道陽先生是凌善元牧師的兒子，請問他是否在從謙堂村長大的？

答：是的，但他後來到了外國升學。

問：那麼羅香林博士呢？他是否與從謙學校淵源比較大？

答：是的，他是太太朱倓我的老師，她用國語教學，你們也應該多學普通話，因為廣東話不能直接變成書面語，相反普通話就是書面語。

問：多謝彭先生解答我們的問題。

答：不用客氣。